

神靈膜拜文化衍生之群居生活文化內涵之探討

翁楷傑*

關鍵字：智人，尼安德塔人，祖靈崇拜，集體性膜拜，薩滿教，地母神

摘要

神靈膜拜衍生之宗教影響人類社會的時間比想像還要久遠，不僅可上溯到現代智人 (Modern Homo Sapiens) 並可上溯到 23 萬年前狩獵採集時代的尼安德塔人(Neanderthals)埋葬已故親人的習俗，亦即祖靈崇拜時代。之後因敬畏主宰天候的超自然力量產生對自然現象的崇拜；影響天候的因素充滿於天地之間，故有天地神、月神、河神等集體性多神膜拜宗教，及眾神之神的一神論。

人是群居性動物，群居的意義在於眾多不同家庭，或不同宗族能鍵結成群，朝共同生活目標邁進以改善生活締造永世性文明。祖靈膜拜主導的社會，各家信仰不同，生活目標不同，故難於匯集成群。集體性膜拜神靈的出現，因共同的信仰，將不同家族及宗族鍵結於一個整體，才得於朝共同生活目標締造不凡的文明。換言之集體性膜拜神靈的宗教文化是驅動文明演進的關鍵。更是地域性文化崛起及全球性文明的基因；如同農業社會之前及後，歐亞等地的薩滿師具有共同的通靈、驅邪等法力之特色。

故本研究從尼安德塔人的來世概念衍生的埋葬習俗，經智人(Homo sapiens)將靈魂概念化及儀式化(ritualized)為開端，依循智人往歐亞等遷徙擴展，狩獵採集時代的薩滿教(Shamanism)，擺脫忍飢挨餓的生活，半農半獵時代食物穩定的生活，進入食物足夠日常所需的社會。之後將首要貢獻者「女性」神化為地母神的宗教文化，經由定居式村莊社會的演進脈絡，從文明不因地理界線而分割之整體性觀點剖析論證，作為城市溯源的先期性研究之見證。

The Exploration on the Immanence of the Gregarious Life Styles induced by Deity-Worshipping Cultures

Kai-Jie Wong*

KEYWORDS: Homo Sapiens, Neanderthals, Worshipping Ancestors, Collective Worshipping, Shamanism, God of Earth Mother

ABSTRACT

Deity-Worshipping Cultures and religion have been affecting the human society for an extremely long time, Not only can the effects of it be traced all the way back to the ancient era of the Modern Homo sapiens, they can also be seen during the time of the Hunting and Gathering Era when the Neanderthals practiced the tradition of burying their dead relatives (also called "The Age of Worshipping Ancestors." After this era, humans evolved to collective worshipping natural phenomena in fear of and due to the respect of the supernatural power that was believed to have the ability to control the weather, which led to the notion of polytheism - a religious discipline which believes in multiple different deities including the God of the Sky& Land, the God of the Moon, and the God of the Rivers - and the notion of monotheism.

Humans are gregarious animals, and the meaning of being gregarious is that people from different families and of different blood can be able to unite as a whole and work toward a common life goal together, so that the living qualities can always be improved and the human life civilization can be everlasting. People within a society where worshipping ancestors is the main core have different religions and life goals, which makes it hard for people to flock together to form a united body. People within a society where worshipping ancestors is the main core have different religions and life goals, which makes it hard for people to flock together to be linked as a whole. We have co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emergence of group worshipping of deities established a common belief among people and linked different families of different blood strains and religions together as a whole, which enabled the efforts toward common life goals and the creation of an outstanding civilization. In other words, group worshipping is the key that drives forward the evolution of civilization and also the foundation of global civilization both before and after the rise of regional culture; take agricultural society with the shamans in the European and Asian areas shared the common magical features of psychism, exorcism, and etc.

Accordingly, this research starts off from the Neanderthals; body-burying tradition induced by the notion of reincarnation and the ancestors of the modern humans- the Homo sapiens; further conceptualization and ritualization of the souls, and then follows through with the heir movements toward the European, Asian, and other regions as well as the Shamanism period during the Hunting and Gathering Era (during which the Homo sapiens had gotten out of the life of starvation and entered a time of half-hunting, half-farming life style with a stable food source sufficient for daily consumptions. Then, this research covers the following era during which the main contributors, the females of the society were deified as the God of Earth Mother, and follows through the evolution of the settled village-style society to thoroughly analyze and to demonstrate, from a humanitarism perspective, that human civilization does not divide over geographic locations as a factual proof for the preliminary study of establishment-tracing of contemporary urban cities.

收件日期：2017.01.23；接受日期：2017.04.28

*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博士候選人(Email: d98544005@ntu.edu.tw)

Ph.D. Candidate, Graduate Institute of Building and Planni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wan

DOI:10.3966/101632122017090101005



一、前言

神靈膜拜與宗教影響人類社會的時間極為深遠，根據考古學不僅可上溯到現代人的祖先，即 10 萬年前出現的遠古人類：現代智人(Modern Homo Sapiens)的時代，並且可上溯到 23 萬年前出現的尼安德塔人(Neanderthals)時期的狩獵採集社會。法國南部拉斯克斯(Lascaux)的岩洞中祭拜祖先靈魂的墓地及族群集體膜拜主宰天候的眾神之聖殿(Sanctuary)都是佐證。自家祖靈的祖先墓地及族群供奉眾神的聖殿形構的儀式性空間，城市學家孟福(Mumford, 1961)認為是定居生活的開端，並且是後世城市集政經教於一的核心，更是城鎮最早的原型(Prototype)。

換言之，由村莊演變而成的城市文明，發展過程雖極為漫長演化細節亦不夠明確，但經由漂泊不定的移居生活而定居式生活的發展脈絡，卻清晰層次亦分明，並且與宗教密不可分。亦即從安葬死者的墓地，經由集體膜拜相同神靈關連的聖殿為主體，在洞穴中形構可避難與棲居的宿營地發展成脫離洞穴的定居式農業村莊。

考古學從印度到波羅的海(Baltic)沿岸的廣大範圍發現 1.5 萬年前出現以漁撈及種植塊莖作物(tubers)為生的小型持久性聚居地(Permanent Settlement)；已有一萬年歷史的大型繁榮的農村(Overgrown Peasant Village)城市史家所稱的城鎮原型(Proto-town)亦即聖經中希伯來先知約書亞(Joshua)率領上帝子民征服的古文明要角『耶利哥(Jerico, c.8500 B.C)』；美索不達米亞(Mesopotamia)的蘇美(Sumer)文明，人類最早的城市，埃利都(Eridu)的第一座建築物就是 5800 年前興建的集體膜拜式神殿(Leick, 2001)等都是佐證。宗教對人類文明影響之大由此可見；因此本研究透過歷史的蹤跡剖析生活環境的遠古起源、功能和社會狀況，並且以膜拜文化為溯源的主軸。

史前時期的人類因彼此隔絕，不同地域的文明發生及進展時間不僅不相同，演化速度的快慢、繁榮持續時間的長短亦不同；邁進另一個階段的時間更是不同，並且差距極大。如遠古狩獵採集社會的捕魚維生，仍存在於當今的人類社會。或以嚴謹的城市文明為例，美索不達米亞發軔於 c.4700B.C.，埃及 c.3200B.C.，中國 c.2500B.C.，馬雅(Maya)c.300A.D.(Morris, 1994) 前後相差達 5100 年。

因此，早期文明的演化歷程無法亦不宜以簡單的時間軸劃分一條一致的演進過程；宜綜合族群的社會文化及其建構的生活環境，如新舊石器時代的墓地、聖祠、聖域，尤其是超越祖靈的集體性膜拜鍵結社群衍生之政治及經濟效應，作為劃分時期及書寫論證標題的依據。

不同地區的文明發軔時間及演化速度間的大落差現象，可用來彌補遠古文明無遺跡可考的缺憾。諸如中石器時代及之前的社會，考古上尚缺可呈現持久性住屋風貌的蹟址，因此，當時期的社會習俗等文化

仍是一片空白。但可師法達爾文的進化論運用異地擷取題材的手法，觀察 5.5 萬年前遷徙至玻里尼西亞的智人尚保存的中石器社會風貌，填補無遺址可考的空白效應。

生活環境的物質性形式，包括聖祠、神殿、聖域、村莊及城鎮等均源於生活文化的特色；例如墓地與神殿不僅都是宗教意識概念化的結果，並且是在思維概念化之前，經長期醞釀發揮的效應。文化特色的另一種現象為：因社會價值觀的變化出現不同的甚至正負相反的評價；例如神祇的以宗教為本的道德向度及非道德向度之價值觀不同，結果截然不同。

綜上所述，涉及物質形式，尤其是群居環境或城市相關領域的探討不宜侷限在開端處或終結面；亦即不僅不宜刻意強調房屋的遺址，並宜以社會相關的政經文化為取向。事實上較完整並可適合當今人類居住的最早農家，1944A.D.哈蘇納(c.6500~6000B.C.)考古所見，磚造牆體高僅剩 1m 左右(Maisels, 1993)，其上仍然是考證上的空白。換言之，文明的演化源於群居社會的集體性需求，故演化過程之探討宜以群居生活，及其衍生之文化內涵為前提，並須彰顯不同時代背景，產生的不同價值觀之需。惟詳論過往的每一件重大環節之時，尤其回溯到上石器(Upper Paleolithic, c.50,000~10,000B.C)時代的朦朧情景，極容易迷失方向。當中不可或缺的重點在於有效傳達集體膜拜文化衍生的效應；諸如鍵結社群的內聚力及道德向度等，才能彰顯論述的主軸。

因此牽涉過往的研究性論述遭遇繁雜資訊的挑戰時，勢必有所取捨與選擇；選擇要件則以社會認知的程度、文化上的影響效應及證據掌控上的綜合性價值而定。符合這種價值體系的資訊，克服困難多方蒐證以求客觀深入，例如考古上狩獵採集時代或城市曙光前的中石器後期社會情境之佐證，可從考古家或人類學家針對不同文化發展區的研究所得加以印證等；不符者割愛以求精闢。

進一步闡明論點，人類居住於東半球的中東或西亞遠早於西半球的美洲大陸；美洲大陸的農業和城市的出現也落後西亞與中東數千年之久。因此 16 世紀中美洲的阿茲特克(Aztec)和馬雅(Maya)文明或太平洋玻里尼西亞的發現，對文藝復興後的歐洲國家言，除掠奪財物拓展勢力外，從超越地域的人本觀瞭解古代城市文明崛起前後集體性膜拜文化衍生的社會風貌，包括酋邦時期的宗教(Morris, 1994; Wright, 2009)才是無價之寶。這是本研究的基本觀點。研究脈絡如圖 1 所示。

二、定居生活的宗教淵源

人類的出現很早，考古家於 1970 年在非洲東北部衣索匹亞的哈達(Hadar)發現之骨骼很完整的女性直立行走人，取名為露西(Lucy)，年代可上溯至 320 萬年前。直立人使用邊緣鋒利的石片支解動物，切割肉塊食用的最早石器為 250 萬年前也在衣索匹亞發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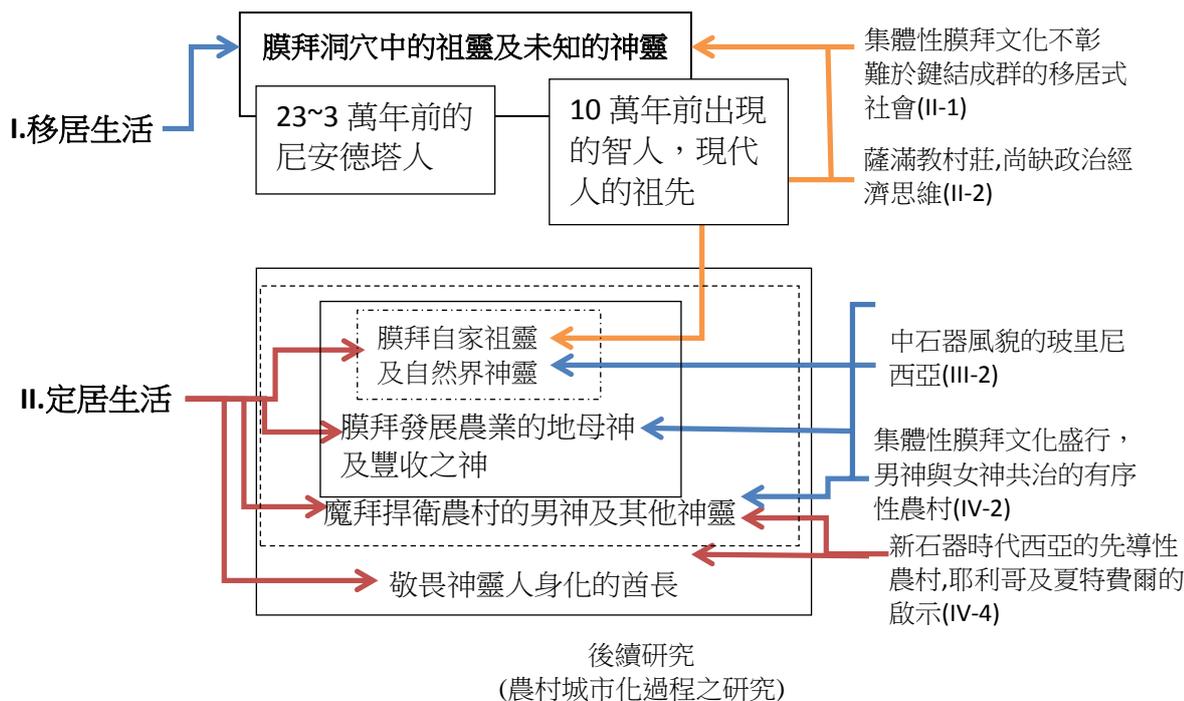


圖 1 研究脈絡

人科(Hominid)動物的大腦平均尺寸約在切割肉塊的石器出現之 50 萬年後，即距今 200 萬年前才開始增加，原因為食用蛋白質含量高的肉類滋養發育的結果，無疑是最早之石器出現的見證。古生物學家李奇(Leakey,L.)於 1961 年在南非坦尚尼亞的奧杜韋(Olduvai)峽谷發現 170 萬年前的人科動物化石，取名為巧人(Homo Habilis)。「巧人」之名仍因該具骨架的手部組織之靈巧，具有製作工具的技能為史前人類之首見(Roberts, 1998; Tattersall,2012)。

可見狩獵採集生活的發軔時間很早，持續時間更長達 300 多萬餘年，考古發現的人科動物之演化過程亦極合理有序，如切割肉塊的石器出現的 50 萬年後的 200 萬年前，因為肉類的滋養，人的腦容量開始明顯發育而增加，並為兩者之間的關係合理的見證。惟獨宗教相關的蹤跡卻未發現，直至尼安德塔人的時代。因此本文從尼安德塔人的出現切入，之後佐與人類天生的生理條件及覓食生活間的互補現象，以彰顯宗教影響下的生活文化之研究主軸。

2.1 墓地與智人的宗教聖域

倘若思考與詮釋超自然現象的生與死的奧秘，並加以概念化及生活化是宗教的基本內涵，則人類世界最偉大最悠久的宗教文化，可上溯到史前的尼安德塔人(Neanderthals)活動的時代。尼安德塔人是距今約 23-3 萬年以前分布於東亞的中國、歐洲西德的尼安德塔河谷、北非的摩洛哥(Morocco)、北撒哈拉(Sahara)、西亞巴勒斯坦的卡默爾山(Mt.Carmel)、中東的伊朗(Iran)之直立行走具有大型腦容量的人種；比現代人的

祖先『智人(Homo Sapiens)』早許多(Tattersall,2012)。

根據 19 世紀中葉及 20 世紀初的考古，尼安德塔人不僅有埋葬死者的墳墓並有陪葬的習俗。中亞撒馬爾罕(Samarkand)附近以一圈獸角環繞兒童屍體，伊拉克北部的莎尼達(Shanidar)洞穴中所見安葬方式即採集大量花朵包裹屍體(從骨骼周圍有花粉遺址得知，圖2)以緬懷並表達對已故同胞的尊崇。換言之尼安德塔人的葬禮不僅精緻並且已習俗化(customized)與儀式化(ritualized)(Roberts, 1998)。



圖2 莎尼達(Shanidar)洞穴中所見尼安德塔人採集大量花朵包裹屍體安葬的佐證 (Roberts, 1998)

習俗化與儀式化的葬禮佐證了尼安德塔人已有一種其他人科動物所無之『來世(after-life)』的理念；來世是一種宗教理念，這種理念認為人世間宛如一場夢，人的今世由一個看不見、摸不到的世界掌控；死雖是今世的終點何嘗不是來世的起點。靈魂和精神的



概念化是尼安德塔人另一個宗教文化的特色，這種概念化宗教意識展現的行為表現在殘暴戰爭後，集體屠殺戰敗者並食用其軀體(Tattersall,2012；柯明憲譯，2014)以擷取其魔力和精神力量的野蠻習俗。

總而言之，不論是正面的、精緻化的、習俗化的葬禮，或負面的食人的陋習，都佐證了早在23-3萬年前的尼安德塔人時代已存在，並主導當時的生活文化。但之後由更優秀的智人發揚光大，才逐漸發展成為道德向度¹明顯的偉大宗教。

尼安德塔人體現一段傲人的成就後，種系的基因經歷混合遺傳出現四肢較直，顱骨較輕，腦容量相若但感知及籌謀策略能力較強的後代，則現代人的祖先，具有解剖學意義的晚期智人。其起源可上溯到c.10萬年前由非洲往地中海島嶼及沿岸地區，包括埃及、希臘、敘利亞及黎巴嫩等西亞及東南歐洲等遷徙拓展(圖3)(Roberts,1998)的人種，遷徙原因公認與冰期環境之暖化有利於狩獵維生有關。因此比晚期智人更卓越的智人，亦經由婆羅洲(Borneo)及巴布亞新幾內亞(Papua New Guinea)到達澳洲，時間約為5.5萬年前。1868A.D.在法國克羅馬農(Cro-magnon)發現的遺跡，具有解剖學上距今3萬年的意義。1930s在以色列加爾默山的斯庫爾(Skhul)洞穴發現生活於10萬年前的智人；無不佐證了智人的起源與遷徙的論點。

必須一提的是美國考古及人類學家泰德薩(Tattersall,I.)博士及英國著名歷史學家羅伯特(Roberts,J.M.)博士針對尼安德塔人的宗教概念中是否已有「來世理念」，雙方看法南轅北轍。泰德薩認為克魯馬農及斯庫爾智人已有今日我們所謂能傳達思維與資訊的語言；種系不同的尼安德塔人似乎尚無能表達或溝通思維理念的語言。沒有可傳達思維的語言，那來有「來世理念」的概念化與儀式化葬禮？

然則存活長達20(23~3)萬年的尼安德塔人與智人

同時存在的時間有7萬年之久。尼安德塔人長期居住的以色列卡夫澤(Qafzeh)山的塔邦(Tabu'n)洞穴與智人居住的巴勒斯坦(Palestine)卡默爾(Carmel)山的斯庫爾山洞穴相距不遠，也很接近葬禮發生的時間；基於泰德薩所倡「文化可在同一個時代橫向傳遞」的理論，即使尼安德塔人初期尚無「來世理念」，儀式化及習俗化葬禮仍可從智人的習俗擷取而得，何況又有莎尼達洞穴所見之(圖2)佐證。

換言之，尼安德塔人在宗教文化上的成就有目共睹，為避免過度彰顯同屬智人後裔的符號化語言的貢獻以致稀釋非屬同一亞種中的尼安德塔人的先導性成就，本研究從人科動物的整體觀點，依循文明演化時間的先後次序及人類活動的蹤跡，並不踰限於某一狹隘的地區或一特定孤立的島嶼，以避免以偏概全，期以客觀的態度解釋尼安德塔人的貢獻，以符文化的動態現象。

2.1.1 生理語彙的宗教涵構

從生活方式剖析，移居和定居是人類二種極為不同的生活方式。狩獵採集維生時代，基於方便取得食物之需，移居比定居具有生存上的優勢；惟就文化的進展恆透過物質形構的硬體生活環境累積而成的文明現象言，移居性生活方式不但無法與定居性生活方式相提並論，並有致命性的缺陷，即移居生活必須有安置無法上場與野獸搏鬥或下海圍捕漁類的老弱與妻小之累。

進一步從人類的生理特徵剖析，新生嬰兒的腦容量約為成人的25%，1年後成長到50%，7歲時才達到成人的尺寸，若計入獨立生活所需之心智上的生活則時間在10歲之後。但猿類出生時的腦容量約為成猿的40%，1年後的幼猿腦部已成長到成猿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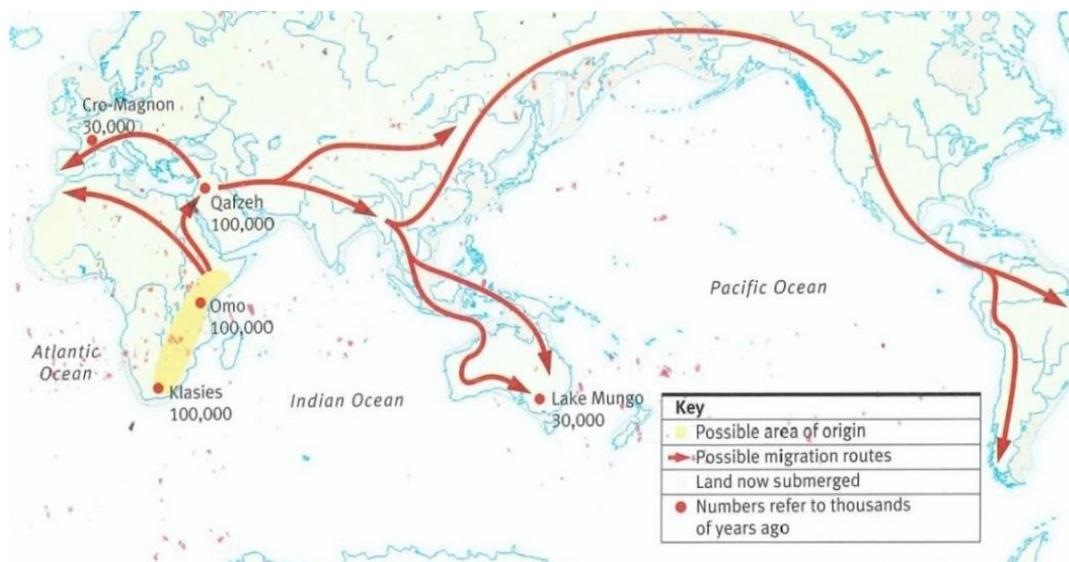


圖 3 早期現代智人之遺址及遷徙路線圖(Roberts, 1998)



80%(Tattersall, 2012)。比較兩組數據，可發現人比猿類或其他哺乳動物更需父母的照顧。換言之，基於生理上的需求，由漂泊不定的移居生活進化到定居式生活之需求，人類比其他動物迫切。

求生是人科動物的本能，維生的基本條件是食、衣、住。人類早在 250 萬年前就知道以大腦較多的智慧，研擬獵捕動作較人類敏捷的動物及佈設陷阱誘殺大型動物的方法。並以靈巧的雙手製作鋒利的石片，支解獵物，切割其肉食用，剝取其皮製作禦寒的衣服及庇護所以防風避雨。所謂靈巧指手掌較其他動物大，姆指能與其他 4 根手指之任一根對應與搭配，發揮協調工作的能力。在奧杜韋發現的石刀，長不過 3.5cm 卻能支解乙頭大象是佐證。

遠古時代的人類，因製作石器的原材料質地較堅硬，非隨處可見，故勢必將可製作銳利工具的優質卵石隨身攜帶。這種確保製作切割工具的原料，衍生的現象為住處附近可發現製作邊緣鋒利如刀的卵石。奧杜韋的考古發現「巧人」的居住處有製造切割工具的質地堅硬之優質卵石及食物是佐證。之外該地更有宿營地遺跡及石造防風設施(Wind-break)(Roberts, 1998)。可見石器時代的移動式營地，已有相當程度的定居性功能。

2.1.2 火神的恩寵

火的發現與使用更是文明演化上一項革命性的過程。考古顯示巧人存在的時空就有火堆在遺址邊燃燒的跡象。南非的史瓦特克倫(Swartkrans)發現約 180 萬年前燃燒的骨骸，肯亞的洛薩甘(Lothagán)發現約 140 萬年前的烤焦泥球，以色列一處約 80 萬年前的遺址發現人類控制下使用火的明確證據「覆蓋灰燼的火爐」(Tattersall, 2012; Roberts, 1976)。

人如何發現自然界力量最強大的火，雖然無從考證，但公認是閃電及落雷擊中乾燥的草木衍生的燃燒烤熟食用方便味道可口的肉類為開端，應該是有科學依據的論證。火不但可以煮熟食物解決消化腸道較短，胃酸較少的直立人食用肉類滋養大腦的基本功能，更有嚇阻野獸侵害確保宿營地安全及照亮黑夜的神

奇功能。因其神奇故以火炬驅趕盤踞洞穴中的野獸做為防風避難的棲居地(Settlement)，成為人類拓展生活領域的開端。圍繞火爐取暖，以火炬突破黑暗照亮大地的技術不僅可培養群體的社群意識，更能將群體活動延伸到太陽西下後的時段。

尼安德塔人時代為緬懷已故同胞的情誼、尊崇祖先靈魂、敬畏未知世界的神靈而祭拜的概念化宗教意識，選擇可防天候及避難的洞穴建築為永恆性聖地(Sanctuary)並為族群永久性聚會地(Mumford, 1961)。聚會地經長期經營發展成為棲居地的現象則由悠久的生理需求累積而成的結果。換言之，人類定居生活以繁衍後代延續生命為開端；經由宗教文化的洗禮促成。

生活形式定居化後，為尊崇往生者及祖先的靈魂進一步將葬禮精緻化，為敬畏神靈將祭拜習俗化；由此形構神聖化及藝術化的禮儀中心，為展現族群的驕傲，進一步將禮儀中心宏偉化成為順理成章的發展；宗教文化的昇華由此形成。宗教進一步發揮對人類社會的影響力。

考古在一個尼安德塔人的墓碑上發現的 2 個刻痕(indentation)公認是先人遺留下來的最早宗教藝術作品，但大量出現並可確認之證據則是上石器時代(Upper Palaeolithic)出現由智人創作的洞穴藝術，時間可上溯到 3~5 萬年前的歐洲，2.7 萬年前的非洲及 2 萬年前的澳洲，換言之洞穴藝術的存在與出現可說是全球性的現象。歐洲出現的精華大部分在法國南部的拉斯克斯(Lascaux)及西班牙北部的阿爾塔米拉(Altamira)等地區的洞穴都是見證。從 1.5 萬年前持續到 9000 B.C. 的第一個象徵藝術(Figurative Art)時期及之後成就的巔峰璀璨期，進一步出現具有聖殿(Sanctuaries)內涵的洞穴，不僅氣象恢宏壯麗並且充滿成群列隊的動物及神秘的、重複的抽象性圖案(圖 4)。

這種具有符號化內涵的圖象，傳達了大約 4 萬年前來到歐洲的克魯馬農人的智能與才華，的確高於尼安德塔人(Tattersall, 2012)，也是智人之所以能在尼安德塔人活動的地盤內取而代之並成為後起之秀的能力之佐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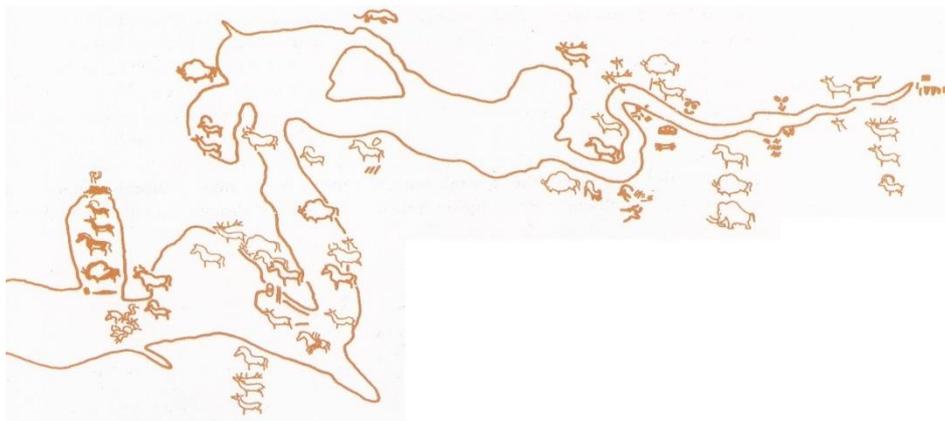


圖 4 舊石器時代智人的第一個穴畫(1.2 萬年前)，西班牙北部坎塔布利(Cantabrian)山蜿蜒的阿爾塔米拉(Altamira)洞穴平面及生動又有符號化內涵的抽象性動物群圖像(Roberts, 1998)

上石器時代智人遺留的符號化洞穴藝術之重要，不僅在於扮演後世由文字傳承思維的功能，更進一步傳達洞穴與宗教及巫術(magic)的關聯。非洲發現的岩石畫(Rock Painting)，城市學家孟福 (Mumford, 1961)，及羅伯特(Roberts J.M.)；宗教史家賴特(Wright R.)等均認為與巫術和薩滿教有關。

之所以有關，仍因岩石畫中蘊含諸多薩滿教的語彙，例如那幅以垂死而橫躺方式表達介於凡界與靈界的南非大羚羊；鼻孔噴血四肢呈懸垂狀，蹄甲無法完全著地以支撐軀體的構圖。尤其是羚羊頭前人物，表明是狩獵採集時代宰殺動物為食的真實寫照是一般性的藝術表現法(圖5)，但羚羊上方那位彎腰鼻孔流血的人，則是薩滿師經歷創痛進入恍惚狀態，以便神靈附身的典型姿勢。都是薩滿師自殘以便神靈附身的佐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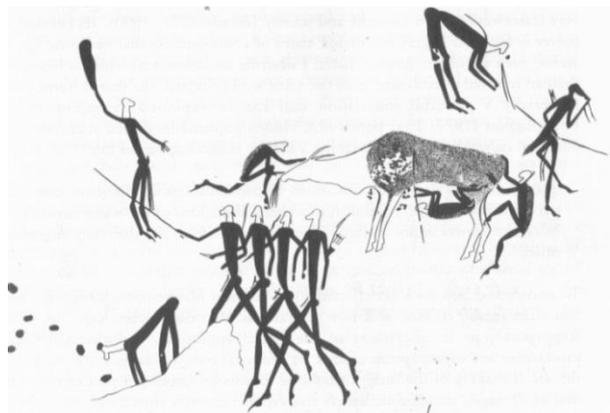


圖 5 南非發現以橫躺姿式表達垂死前介於凡界與靈界的大羚羊。鼻孔噴血四肢蹄甲成懸垂狀的羚羊頭前的人物，是狩獵時代宰殺動物為食的寫實表現法；羚羊上方那位彎腰鼻孔流血，後方那位二足交叉鼻孔噴血，左前方那四位以扣針繫穿生殖器的胛骨狀人物等都是薩滿師以自殘方式進入恍惚狀態以便神靈附身的語彙。(Price, 2001)

2.2 薩滿師活躍的村莊生活文化

宗教思維的概念化方式反映族群的生活特色，生活特色因時間的推移而演進時宗教思維也呈現對應式的演進。前農業社會的狩獵採集人由移居邁進定居式生活後宗教文化也出現對等式的成長；能與神靈溝通預知超自然現象的人，因享有特殊社會地位成為宗教的領導者。領導者為確保及維繫並擴大已享有的特殊地位，進一步頂著宗教的光環運用政治謀略，循族群生活方式演進的步伐，發揮更大的影響力。薩滿師是這種演進過程的重要角色。

前農業社會時期存在於不同地區的薩滿師(Shaman, 包括藥師 Medicine men, 巫醫及巫師)雖彼此隔閡並以不同方式呈現其法力，宗教上卻有共同的特色，亦即都宣稱：可跟主宰人類社會的神靈世界溝通，以法力控制危害人身的疾病並可掌控變化無常的氣

候。本文參考賴特(Wright, 2009)的資料分治病、禦敵、通靈及預測三項列表分析歸納如下：

一、治病

1. 安達曼(Andaman)群島(位於孟加拉灣)的薩滿師以揮舞一根燃燒的木頭驅走惡靈救治病患。
2. 阿拉斯加南部特林吉特(Tlingit)區的薩滿師穿戴特製的圍裙與面具後環繞病人跑，並向精靈唱歌以驅走病魔。
3. 非洲卡拉哈里(Kalahari)沙漠地帶的康桑(Kung San)藉薩滿師透過數小時的跳舞進入恍惚、出神後與亡靈或神祇溝通方式為人治病。

二、禦敵

1. 美洲東部的薩滿師以拇指和食指捏碎穀粒後撒出粉末聲稱可殺死數十英里外的敵人。
2. 澳洲的薩滿師以唸咒後的骨頭指向被詛咒的敵對者以取其命。

三、通靈及預測

1. 歐亞大陸和北美最北的薩滿師以各種方法包括跳舞用的音樂節奏或禁食或自殘式疼痛，使自己進入恍惚出神狀態讓神靈附身並指點迷津。
2. 美洲大陸的薩滿師則透過異象或夢境跟神靈溝通傳達族群期盼的信息。

可見薩滿師乞求法力方式恆以解除軀體上的痛苦及生存上遭受威脅為主軸，缺乏後世宗教追求之：超越凡俗的肉體，進入精神存在(spiritual existence)的源頭以求心靈上平靜為目標的思維。

這種僅止於肉體的宗教文化傳達二點狩獵採集社會的特性，生命的維繫與生命的繁衍為族群共同的生活目標，長命百歲與多子多孫是福氣也是神的恩賜。食與性，因此成為環繞生活的中心議題，結果是人類的生殖器官成為儀典上供奉祭拜的物象，並轉化成紀念性建築語彙留傳給後代；象徵男性的紀念碑尤其是埃及的方尖碑(Obelisk)，象徵女性的穹窿(Vault)都是佐證。

當一個社會專注於：向超自然世界招魂並乞求法力再以咒語驅除危害人體或族群的鬼靈，或以法力擊敗戰爭中的對手，或向鬼神求問隱藏於超自然的訊息以預測未來的發展與遙遠的事件……等成為共同現象時，跟著衍生的情形為：預測人在世間的福與禍，設法趨吉避凶等神秘現象自然成為社群追求的共同目標。為達成這種超自然現象的目標，探索與解釋吉凶出現的原因，預言出現的時機，提高好事降低壞事出現的機率，包括驅除病魔化解疼痛，瓦解敵對者魂魄等成為社群生活的風尚。

為掌握先機，自然會有人競逐族群運勢的詮釋權，也會有人從競逐中脫穎而出成為預言未知世界的主導者；於是能否確保族群生活與成長茁壯的現實問題，成為晉身領袖級人物的關鍵性條件。結果為：預知與掌控未知世界的薩滿師不僅角色關鍵並且影響重大。努伊特人稱薩滿師為 anagkok，領袖為 anajkok，字眼幾乎相同就是薩滿師位居關鍵地位並且是政治角色



的始創者之佐證。薩滿師時代的村莊『宗教與政治角色』之間的關係，根據賴特(Wright, R.)的資料可歸納為四：

1. 薩滿師與政治領袖大多由同一人擔任。
2. 有薩滿師但無政治地位的宗教領袖。
3. 鮮少有政治領袖但無薩滿師的村莊
4. 雖有未以薩滿師為政治決策者的村莊，但當面對生死關頭的戰爭時大多仍會以占卜決定求和或求戰或進一步的戰略取向，因此薩滿師仍有極關鍵的影響力。

2.3 小結

總而言之，求生是人科動物的本能，人類使用「火」煮熟食物的飲食習性至少已有 80~180 萬年之久。因此人類的飲食習性呈現生物性的演化過程，亦傳達文明的演進脈絡。原因為，人類牙齒的尺寸較其他肉食動物的牙齒小，小的牙齒著重於磨碎食物，不利於咬碎肉塊。換言之，人類的祖先是專吃植物的素食者，不是肉食者。惟人類擁有比其他肉食動物特大的「大腦」，尼安德塔人的腦容量約為 1350cm³，約為現代猩猩腦容量(300~350cm³)(Tattersall, 2012)的 4 倍，因此思考能力奇強。但人思考時，負責思考的大腦不僅是人體器官中能量消耗最大者，更是耗能極大的器官；極需較高含量的蛋白質和脂肪，才能發揮大腦思考的正常功能。

總而言之，人類必須獵捕動物再以火煮熟食用，經消化程序後，補充思考消耗的蛋白質和脂肪，才能以智取勝，成為萬物之王。

考古繼鋒利的石片之後發現，上石器時代的人類社會就會利用人骨或鹿角等材料，銜接木頭製作狩獵工具和弑殺敵人的武器。梭魯特(Solutrean)文化的燧石(Flint)，法國的馬格達里(Magdalen)文化(c.15000~c.8000 B.C.)精良細緻的骨製魚叉(Harpoon)都是見證。上石器時代的終結期工具與武器的製作技術更加成熟進步，燧石工具不僅精巧普遍形狀更趨幾何化；單項工具或武器形式的幾何化與規格化代表技術的躍進；亦即人類已能生產由數種單一武器組合成較精巧複雜的武器。同時代普遍出現的弓與箭、矛或槍的投擲器，帶刺的魚叉等都是在政治思維影響下，技術文明得以躍進的結果。魚叉搭配漁網與繩索，更是狩獵活動由陸地擴展到水域的見證(Roberts, 1998; Liu & Chen, 2012)。如此進步的狩獵工具及舊石器時代洞穴中生動的動物紋壁畫，顯見人類的肉食生活已很悠久；並且在尼安德塔人之前，狩獵技術已很純熟。

純熟的狩獵是團體合作無間的結果，尤其獵殺體型較大的動物。共享獵物，成為狩獵後氣氛高昂的慶功宴。圍繞烹煮的火爐，既可取暖又可凝聚成員間的感情，更可培養合作默契，家與族群的概念由此衍生，並日形牢固。

圍爐而食，或圓桌形饗宴的空間行為，因此成為

習俗。居住地球五大洲的華夏文化後裔即使 21 世紀仍不分國籍，每年都以華裔自有的「除夕圍爐」迎接新年的習俗為榮，並為文化印記。

概言之，狩獵採集社會的獵人以數人或數個家合作方式獵捕動物及圍爐進食的方式，孕育牢固的家庭概念，並衍生成熟的定居式生活群。因此，薩滿師活躍的年代每家住戶都有自家的墳墓、自家的神龕、自家的爐灶。但家庭之間，除大型狩獵外，尚無可進一步鍵結不同家庭以形構社群的神靈信仰文化。宗教與政治的結合與互動亦處於磨合期，更缺乏以政治策略領導族群拓展生存基礎的理念。故村莊規模不大，城市學家孟福認為侷限在 6-60 戶住家的小型群體。

總而言之，狩獵採集時代薩滿師活躍的村莊，尚缺角色明顯又可肩負政治重任的領袖人才；惟政治是人類社會，包括前農業社會時代的村莊能否快速成長茁壯並進入城市化過程之關鍵。村莊的成長及城市化，根據後世的實際情況無不透過政治思維及其衍生的謀略，將族群中的成員按照專長分類、組織並賦予適當的工作，以發揮整體性運作效應為開端。恰如人體各部器官，依據生物性功能，不論在哪種狀況下，都能以同一種節奏及同一種秩序，發揮超越單一體之總和的整體性運作效應於極致。

亦即分工合作，共同蒐集族群生存繁衍所需資源；諸如責成專人發明與製造狩獵採集所需工具及武器，組訓軍隊克服或掃除生存上的障礙，以武力掌控範圍更廣、食物更豐富的資源，以強勢的姿態推銷其供奉的神靈，往外拓展生活領域公認是人類文明進化的法則，也是村莊成長的關鍵。若不然，將步上萎縮的宿命。

三、園藝型農業社會的宗教社群

新石器(Neolithic)文化是紀錄與描述人類由狩獵採集社會邁進農業社會所締造文明的總稱；源於冰河終結時的c.10,000 B.C.之後，人類維生不可或缺的食物增加並且超過日常生活所需，對生活及社會文化產生連鎖性效應成就的文明。如同上石器或舊石器(Palaeolithic)文化的演進過程；不同地區的族群生活技能背景不一，因此不僅發展時間、繁榮持續時間、終結時間不一，文明展現的形式亦不同。新石器時代的最早雕刻，西亞出現的時間為c.8000 B.C.歐洲為c.6000B.C.就是佐證(Roberts, 1998)，故不宜以一條固定的時間軸區別。

畢竟文化的孕育與形成不僅須長期累積前人的生活經驗，並須經歷長期的醞釀與發酵方能竟其功；故不同地區之間仍有演化過程緩慢、演化時間極漫長的共同現象。緩慢與漫長的現象代表演化是漸進的，不是突變的；過渡期是漸進式的中繼站。因此，由狩獵採集社會邁進農業社會的過渡期，亦即園藝型農業或稱半農半獵村莊的討論，成為不可或缺的環節。

3.1 園藝型農村的生活文化



狩獵採集時代的人類因食物來源不穩定，忍飢挨餓是普遍現象，即使狩獵技術超高的彪型大漢，運氣差的時候仍須面對食物無繼，過一天算一天的生活困境。c.14000 B.C.即中石器(Mesolithic)時代是轉捩的年代；人類進入定居式生活，不僅在住家附近栽種大麥、小麥及可食用的野生禾本植物類的穀、甘蔗等，並且馴養家禽等隨時可取得之食材(Morris, 1994)為生。換言之，以固定的住所為家生產部分日常所需食物以輔狩獵採集不足之需，誠為人類食物來源增加免於忍飢挨餓而已；與新石器時代的農業革命衍生的社會富饒，尚有一段很大的落差，惟有較多時間發展更開闊的生活內涵是其開端，更是公認的進展。

考古學從印度到波羅的海(Baltic)沿岸發現眾多持久性聚居地(settlement)，以捕撈蚌及魚為基礎並以栽種塊莖作物作為捕撈不足時之需，就是這種以狩獵為主種植穀物為輔的產業型態之佐證。隨著中石器時代的發展，不僅小村莊(hamlet)及農用開發地陸續出現，雞、鴨、鵝、豬等也成為食用的家禽；此外蔬果如橄欖、葡萄和蘋果也是中石器時代的成就。考古提供的進一步佐證為c.10,000B.C.時法國塞恩(Seine)河谷所見遺址；以木材為骨架，骨架四周以沿環狀排列的石頭強化，斷口處為入口搭建一端有生火處的圓錐形帳篷式住家(圖6)，聚居地規模可能已達400~600人(Roberts, 1998)。但因木材壽命不長，完整風貌只能算是一種推斷；惟可肯定者聚群而居的現象，應與宗教文化影響下定居化生活衍生的貢獻有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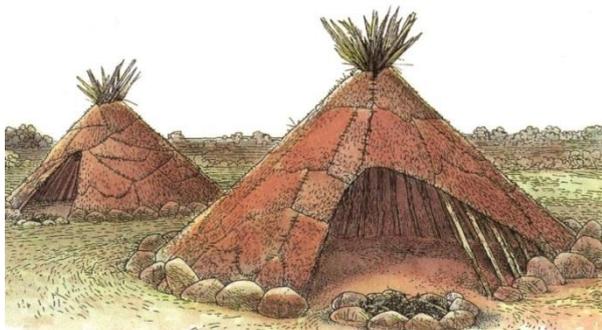


圖 6 有生火處的圓錐形帳篷式住家 (Roberts, 1998)

無奈當時尚無可傳達生活方式，又長期保存食物的陶製類用品，亦無日曬磚等壽命較長之建材，更無文字上的紀錄。故有關聚群而居衍生比從前複雜的社會問題之解決方式，如生活秩序的規範、財物與土地持有權之保障等在宗教向上顯示的意義仍有待探討以釐清。幸好不同地區的文化持續時間之長短不僅不同並且差距極大，故中石器或新石器時代的狩獵採集為主，農作及馴養家禽為輔的社會，18世紀中葉仍存在於玻里尼西亞(Polynesia)人的生活和社會習俗中。換言之，18世紀的玻里尼西亞是一處可借景的中石器社會景象(Mumford, 1961)之標本。

3.2 玻里尼西亞的中石器生活文化

玻里尼西亞為中太平洋諸島群的總稱，範圍極廣，包括遠在北太平洋的夏威夷群島及南太平洋的紐西蘭，核心區為大溪地(Tahiti)所在的社會群島。玻里尼西亞文化圈另有二個區，其一為菲律賓東邊的密克羅尼西亞(Micronesia)，另一為澳洲東北邊的美拉尼西亞(Melanesia)。前者包括關島(Guam)所處的馬里亞納(Mariana)群島，及帛琉(Palau)與雅浦(Yap)所處的加羅林(Caroline)群島。後者包括新幾內亞(New Guinea)，所羅門(Soloman)群島及東邊的斐濟(Fiji)。居民來歷不僅源遠流長並可上溯至5.5萬年前分二條遷徙路線，由地中海東岸的卡夫澤(Qafzeh)進入澳洲的智人(Homo Sapiens)；其一為經由馬來(Malay)半島、爪哇(Java)越過班達(Banda)海進入西澳洲，其二為經由婆羅洲(Bornea)，巴布亞新幾內亞(Papua New Guinea)進入東澳洲的祖先(Roberts, 1998)(圖3)是玻里尼西亞文化多元的開端。

3.2.1 多元族群的共同語言-宇宙神

兩股遷徙澳洲的智人，伴隨長期跋涉過程出現的血緣混合本就多元，進入澳洲之後的長期發展衍生之種系融合更為複雜多元。故根據專精玻里尼西亞的美籍學者黎吉爾(Ridgell, 2006)及人類學家奧利佛(Oliver, 2002)教授長期田野研究所得，歸納數點如附圖7所示，剖析於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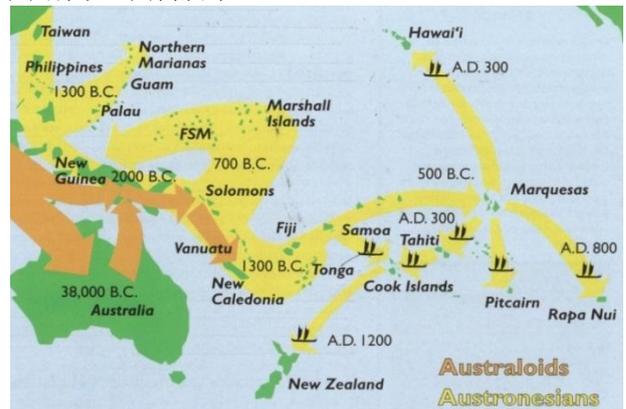


圖 7 現代智人遷徙路線圖(Ridgell, 2002)

1. 約在4萬年前(c.38000B.C.)膚色暗黑(dark-skinned)居住於巴布亞新幾內亞的澳洲、錫蘭(Ceylon)及蝦夷(Ainu)系狩獵採集人往東北方向的俾斯麥(Bismarck)及所羅門(Solomon)群島遷徙，過著與世無爭的生活。
2. 4千年前(c.2000B.C.)散居不同地區的淺褐色務農的歐斯突洛尼西亞(Austronesia)人²，為生存遷徙至暗黑色狩獵採集社群居住區。二種不同膚色的族群，不僅未以覓食方式不同，進住時間先後相距數萬年而激起紛爭，並且進行族群間的通婚。這是狩獵採集及農耕人口融合成村的開端，半農半獵社會誕生的見證。
3. 約3千3百年前(c.1300B.C.)部份淺褐色澳洲族群開



始移居斐濟(Fiji)群島的瓦奴阿杜(Vanuatu)及新喀里多尼亞(New Caledonia)。

4. 因快速發展故進一步往東邊的勞(Lau)及距離更遠的東加(Tonga)及薩摩亞(Samoa)定居。約在同一時期膚色較暗之不同澳洲系的族群直接從菲律賓及印尼居住區遷徙至加羅林(Caroline)群島的貝勞(Belau)³、雅蒲(Yap)及馬立安納(Mariana)群島。
5. 膚色較淡未與暗膚色種系混合的族群在東加及薩摩亞開枝散葉後成為後世(1756A.D.)所稱的玻里尼西亞人。玻里尼西亞為希臘文許多島嶼之意；泛指澳洲東邊、菲律賓及馬來東邊的太平洋地區之島嶼。
6. 約2700年前(c.700A.D.)澳洲系族群遷離位於澳洲東北部的美拉尼西(Melanesia)群島進住西玻里尼西亞及東密克羅尼西亞(Micronesia)。
7. 約1000年前(1000A.D.)的遷徙潮，大部份澳洲族群選擇遠離東加(Tonga)及薩摩亞(Samoa)群島的玻里尼西亞。庫克船長轄下的軍官認為：為避免地理上的混淆，應以居民的語言、宗教儀式、藝術(arts)及習俗(manners)相似的島嶼為玻里尼西亞的定義。因此氣候酷冷、島型超大、群居文化居民來源差異性明顯的紐西蘭將不在本文討論範圍，以免論證失焦。

換言之，玻里尼西亞是多元文化的社會。經長期的跋涉再由馬來半島及婆羅洲進往東西澳洲的智人是多元的開端。其次為廣泛的歐斯突洛尼西亞農耕族群，由廣闊疆域移入激起的種系混合出現的社群更為多元。尤其是不同覓食方式成就的半農半獵社會，不僅生活文化多元，更因食物來源日趨穩定成就的文明益形多元。多元文化表達在血緣及傳達思維理念的語言之差異性由此而生。因此不同族群若想由和睦相處而融合，勢必先化解語言上的障礙，溝通不同的思維，彰顯同屬一個宇宙的凡人之信念，亦即宇宙不是神的產物。宇宙就是神的(Pantheistic)宗教信仰，才能發揮融合的效應於極致。

半農半獵的玻里尼西亞先民社群，因宇宙神成為不同語系的族群之共通語言，因此容易融合於一而發展快速。快速的發展衍生的磁吸效應，引發澳系智

人的遷移潮。其一為膚色較暗的族群，循地理上的優點，由菲律賓及印尼移居密克羅尼西亞的貝勞及雅蒲等地。其二為捷足先發的淺褐色族群由澳洲移居美拉尼西亞的斐濟(Fiji)及玻里尼西亞的東加與薩摩亞等地。這批移民開枝散葉後進一步往東遷徙，深入玻里尼西亞的核心，即法屬的社會群島(Society)，包括聞名的大溪地(Tahiti)。這批先民就是後世所稱之玻里尼西亞的祖先(圖8)。

如此複雜的演化歷程締造的文明因多元衍生生態與人文上的雙重獨特性。人文社會的獨特性指標為共有35種以上的語言(Oliver,2002)。生態上的獨特性指標表達在由2萬座以上的小型島嶼組成，但陸域只佔海洋總面積的0.0025%(Ridgell,2006)。因此有關玻里尼西亞的探討勢必以較廣闊的視野為之。亦即上述複雜的演化內涵外，尤須把握共同語言即宗教文化孕育下，半農半獵生活呈現的二個關鍵性要項：

1. 陸地生活文化內涵，包括生產食物的果園、菜園及飼養家禽等生活活動。
2. 出海捕撈及島嶼間連繫不可或缺的相關活動展現的文化。

準此而論，以約6千年前由歐斯突洛尼西亞進住玻里尼西亞的部份先民，係由台灣及南中國地區而來的假設(hypothesis)(Oliver,2002)⁴，或根據遺傳上的DNA認為由南美而來的說法均因仍有爭論迄無交集(Ridgell,2006)。畢竟以語言或DNA取代文化不無以偏概全之嫌。不同血緣的族群使用相同的語文，尤其是英文；或血緣相同的華裔，使用不同的語言當今尤普遍。「血緣與語言」的混合並且可上溯到尼安德塔人的時代等都是見證。

概言之，總體性文化是重點，宇宙的神掌控的宇宙衍生的信仰才是玻里尼西亞的共同語言。宗教文化成就的語言鍵結眾多不同種系，並融合於一的多元族群是玻里尼西亞的開端，也是玻里尼西亞綻放永恆性魅力的文化根源。17世紀到玻里尼西亞的英法人士，因體認當中奧妙故不但揚棄15世紀的西班牙在中南美洲的阿茲特克(Aztec)及馬雅的掠奪與殺戮⁵，並且對玻里尼西亞獻上無限的呵護。



圖8 正統玻里尼西亞後裔的社會群島仕女肖像 (Oliver, 2002)



3.2.2 神授政權的首邦

源遠流長的智人(Homo Sapiens)從4萬年前開始的遷徙後，經長期的演化，約在1萬年前的玻里尼西亞，已進化到如同中石器時代的歐洲能掌握足夠日常所需之食物 (Oliver, 2002)。這些島群因四面環海與世隔絕，未受技術文明洗禮，故始終保有中石器社會的純樸。即使英國探險家庫克(James Cook, 1728~1779)，繼數位歐洲冒險家，包括1521A.D.的麥哲倫(Magellan)之後於1760及1770年二次探查為迄 (Ridgell, 2006)，玻里尼西亞仍維持以狩獵採集社會的純真融合園藝型農業的村莊結構，及直通神靈的首邦(Chiefdom)社會的本質。

酋長因能直通神靈，故擁有超越平民的特殊地位，為彰顯並維繫其統治地位，運用神聖的宗教光環駕馭政治事務，並融合成一個整體以發揮集政治與宗教於一的神授王權統治效應。

酋長將自己神格化，以塑造明顯的社會階級是最基本的手段；門當戶對的婚姻以強化貴族的地位及確保統治階級的純正血緣是玻里尼西亞普遍存在的現象；在社會群島就有平民不得進入神廟中向神祇奉獻貴重供物的場所之規定，無非以階級壟斷與神靈溝通的特權。

換言之，玻里尼西亞的酋長對當地的居民而言就是神；為彰顯酋長的神格，當地最普遍的禁忌就是不得與酋長有軀體上的接觸。酋長講話時必須洗耳恭聽，酋長出巡時平民必須站立道路兩旁不得踰越，唯一允許的是以卑微的姿勢向酋長深鞠躬再摸其腳，以示發自內心的敬畏。

庫克船長頭二次到玻里尼西亞時，被認為是神祇降臨，故有敬畏式的招待。第3次在夏威夷因船難故被當成凡人闖入，以致被殺。庫克對玻里尼西亞的感言為：社會階層明顯紀律嚴明，各階層的成員如同人體各部分組合，不論在哪種情況都遵守秩序，不僅和諧一致並有高度的社會凝聚力，準備隨時服從神靈的使者：酋長的命令(Wright, 2009)。

3.2.3 組織化及紀律化的宗教社會

組織化社會是這種高度服從的基礎；數個居住於同一地的家庭組成一個宗族(clan)，數個宗族組成一個有社群(community)內涵的部落(tribe)(圖9)並以社群共同信仰的神靈(圖10)為核心，形構村莊式的社會就是酋長統治權力的基本模式。統治區的大小及人口規模雖然不相同，相差也極大，但有二個共同現象。其一為組織化社會有數千年歷史；其二，規模比狩獵採集社會大很多。庫克船長在夏威夷被殺時當地酋長的統治區有34個部落，東加(Tonga)酋長的統治區則往北延伸到550英哩處的薩摩亞(Samoa)群島(Oliver, 2002)。惟統治區不論大小，家是酋長統治下的基本單元，故酋邦的社會風貌宜從住家的建築內涵切入。

以生活容器為目標並為定義興建的住屋，須滿

足的功能雖因人而異，但以能滿足睡眠所需條件仍是共同的要項。故住家無隔間，亦即一屋一間式房屋是帳篷式住屋的基本形式，也是定居式住屋的開端。17~18世紀時太平洋的玻里尼西亞島嶼尚可見之中石器社會內涵的一屋一間式茅屋見證了：滿足睡眠恢復體力是建築文化之開端的論證。

追隨庫克船長第2次(1772~75A.D.)到玻里尼西亞的人類學家佛斯特(Forster, G.)勘查社會群島東邊杜莫杜島(Tuamotu)的純睡眠用茅屋的記錄是第一手資料：『長10~15m，寬1.5~2m，高度小於人體的低矮簡陋的茅舍，除入口外並無其他可供通風採光的開口，故茅舍內不僅陰暗更無法站立（除了屋脊下），亦空無一物。除散落地上的睡眠用稻草外』。這是杜莫杜所見供數人在晚間擠進睡眠的景象(圖11右下)。杜莫杜群島房舍之簡陋由此而見，難怪洞穴是人類生活之開端。

相較於氣候寒冷樹木較少，農作物耕種困難的東邊島嶼，亞熱帶型的薩摩亞群島資源豐富建材充裕。故薩摩亞的住家不僅興建於碎石堆積墊高的地盤，以免室內潮濕外，並以大型木料構結的柱樑為房屋的骨骼；故兩柱之間都可敞開供通風採光。因此室內涼爽光鮮亮麗。換言之，薩摩亞的住家面寬進深及高度均超過簡陋的杜莫杜許多，故視野寬闊(圖11左下)；寬闊舒暢的屋內可區分成睡眠、就座休息或工作的空間功能區。薩摩亞的住屋尤須一提的是使用繩索捆綁茅草覆蓋屋頂連接不同面向的前後屋頂，技藝之純熟，令後人印象深刻。

建築用木料充裕的亞熱帶島嶼，因擁有可耕種農作物的優越條件，經濟較好的家庭很快就進化至一屋多間式的生活格局。故除睡眠外也有廚房；較富裕者更有貯藏多餘食物、工作及供奉守護神的宗教空間。

廚房與工作空間因功能特殊，故恆以單斜面屋頂之小屋與毗連主屋之佈局構築；獨木舟(Canoe)是重要資產，故船屋興建地點總是主屋視線可及的岸邊。夏威夷的傳統，獨木舟的船屋總是童年時代就開始的生活中心(Oliver, 2002)。

換言之酋長時代的玻里尼西亞，因日常生活所需食物不虞匱乏，人口及統治圈也比從前大許多；雖尚不及新石器時代的農業革命在西亞成就的富饒社會，但財富引起的貪念及衍生的社會問題之嚴重及人多事雜的現象仍是必然結果。狩獵採集時代食物缺乏，故村莊規模小個人亦無財產可言，6-60戶住家形構的小型村莊村民彼此之間均認識，守望相助成為生存要件，無必要也無從侵犯他人財物，因此犯罪機率極低。酋長統治時代的園藝型農業社會則不然，不僅個人值錢東西較從前增加許多，家家戶戶又都有菜園和果園及家禽，犯罪誘因較從前增加許多；加上村莊人口眾多，少說數千人甚至由數萬人構成，村民彼此之間又較隔閡，宵小容易得逞，犯罪機率自然比從前增加許多。貝勞(Belau)畫家吉朋斯(Gibbons, C.)根據1783A.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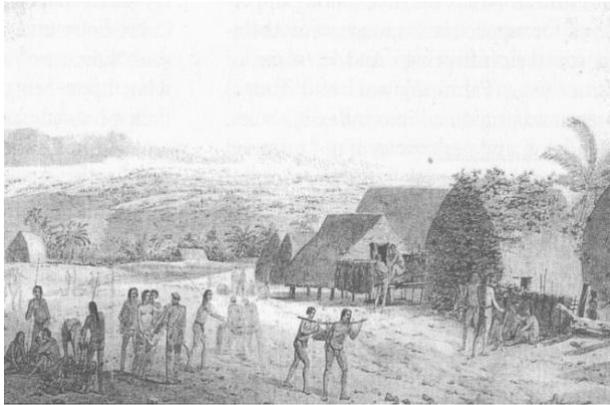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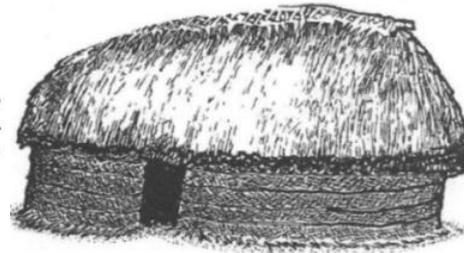
圖 9 玻里尼西亞的社群結構，夏威夷所見不同家屋環繞公共開放空間而居的村莊景象 (Oliver,2002)



圖 10 拉巴奴尹 (Rapa Nui)的阿那基那島 (Anakena)之宗教聖地之神靈雕像 (Kaeppler, 2008)



大溪地(Tahiti)



東加(Tonga)



薩摩亞(Samoa)



杜莫杜(Tuamotu)

圖 11 玻里尼西亞所見 4 種中石器社會的茅草屋住家(Oliver, 2002)

在貝勞遇難報廢的英國船羚羊(Antelope)號收集的資料，描繪的貝勞「從岸邊的珊瑚礁到山上的村莊」綠色盎然生動的景象(圖12)是極好的見證。

繁榮多元的社會，犯罪誘因及犯罪方式不僅複雜多變而且日新月異；這種現象既非依賴洋洋灑灑的法令規章所能遏止，亦非執法單位以嚴厲的懲罰所能消除，宗教文化的力量卻可發揮未雨綢繆的嚇阻效應。因此薩摩亞人不僅相信神祇會以疾病，更會以死亡懲罰竊盜者並且會殃及到賊的父母及近親。東加人相信神祇會指使鯊魚攻擊偷竊者，因此竊盜不敢在鯊魚活動季節捕魚充飢。夏威夷人相信被人殺害者的靈魂會對兇手糾纏不休，直到兇手被懲罰。薩摩亞人針對民眾的冤情有更積極的體制，即組織名為「福諾(fono)」

的陪審團負責仲裁解決懸案，但仍以神祇的力量為基礎；如責成嫌犯對神發誓以表達清白，或被要求喝下特種飲料後以其反應判斷有罪或無罪的依據(Wright, 2009)。總而言之，玻里尼西亞的宗教意識不僅對當時期社會秩序的維持有明顯的影響力，並且對後世的法治體制揭示了一個正面的方向。

3.2.4 瑪納(Mana)與塔普(Tapu)

多神崇拜及多島嶼組成的玻里尼西亞，對保護各族群的特定神祇之角色雖有不同的詮釋，但卻有共同的宗教概念：都是以神靈為基礎並為生活導向的社會意識。瑪納與塔普就是展現與傳達玻里尼西亞核心價值體系的宗教化共同用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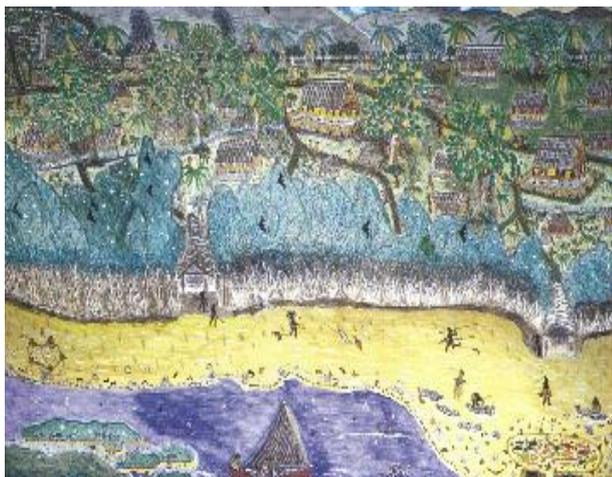


圖 12 綠色盎然生動的貝勞村莊景象：從岸邊的珊瑚礁到山上的村莊(Kaeppler, 2008)

瑪納指一種神授的超自然力量，塔普指規範或限制瑪納的法力並延伸成「禁忌」的文化；這二種概念性的宗教力量不僅互為表裡，並且互相糾結融合成一個整體。玻里尼西亞人的生活哲理認為：神賦予人世間的法力，視社會地位的高低而定。世襲的酋長最高，其餘為海洋專家、工匠、戰士、祭典時奉獻高價值供品的高社會階級人士，最後為平民 (Kaeppler, 2008)。倘若瑪納是酋長統治權的保證，則塔普是制衡酋長濫權無能與腐敗的利器。原因為政治上的效率象徵神的支持與寵愛，政策上的偏差或失誤代表酋長失去神的支持與寵愛，沒有神為後盾的政策若不及時罷黜惹出大禍將是後患無窮；遊手好閒的宵小若不嚴加懲罰繼續為非作歹也會危害社會的運作。

因此玻里尼西亞人不僅高度相信與依賴超自然現象，並且認為所有嚴肅的事情均與神靈有關 (Kaeppler, 2008)。

魚是島嶼居民的主要食物，捕魚便成為很嚴肅的行業；漁夫出海後可能滿載而歸也可能空手而回，也有可能回不來。因此需要海神與空氣之神帶來風平浪靜的氣象以確保漁夫的安全；並須有漁網之神眷顧撈捕大批魚貨而歸。這種因果現象衍生捕魚季開始前都會有祭拜儀式，出海捕魚前一晚睡在捕魚之神的神廟接受神的加持以便有充沛的體力，就是瑪納；相對應的情形為不得在神廟以外的地方過夜，以避免消耗體力，就是塔普(禁忌)。

海洋、島嶼及超自然的天空，玻里尼西亞人認為是構成世界的三個基本元素；故以獨木舟征服動態性的海洋，鏈結島群中靜止不動的島嶼，並以捕魚為食是世界運作的基礎，也是生存之道。從建造過程言，動態性生活容器的建造，超越靜態性生活容器(房屋)的建造。故獨木舟的建造不僅是極嚴謹的宗教課題，並且可與住屋的宗教意義相提並論或有超越之處，因此獨木舟的建造處成為村民聚會的場所。

為克服島群間及島嶼間複雜多變的海象及頻繁的聯繫，獨木舟前後的船頭與船尾雖不對稱，但須賦

予互補的功能(Kaeppler, 2008)，以便海象突變或航路曲折時能在海神及空氣之神的護佑下即時將船尾當成船頭使用，發揮順風航行的效應，以免耽誤生計或及時脫離險境。

根據神靈的指示(託夢)揀選最適當的樹木是建造獨木舟的開始，不論是單體舟或可乘載50人以上的雙體舟，砍樹的前一晚造船師須在樹旁紮營、禱告及奉獻供品，乞求神靈賦予較多的「瑪納」以便能順利建造堅固耐用、性能又多元的船體。即使舷外支架的安裝仍須以審慎莊嚴的心態為之(圖 13)以確保風浪大時船體穩定不翻覆。建造完成後尚須到漁夫的守護神庫拉(Kuula)廟祭拜，惟守護神不只一位並且對色彩各有不同的詮釋與堅持，如果選的神靈排斥黑色，則祭拜時不得有任何黑色的東西出現；包括住家的擺設，否則犯忌亦即觸犯「塔布」反而惹惱神靈產生反效果。建造戰爭用的大型獨木舟尤應避免冒犯「塔布」。

戰爭在玻里尼西亞是一件司空見慣的社會現象，並且如同週期性的宗教祭典成為村莊生活的一個環節；原因不少，如報仇、征服弱小擴充領域以攫取更多生活資源等。但以宗教信仰上的動機最關鍵，亦即強擄對手做為宗教祭典的祭品。統計顯示從 1798~1805 A.D. 及 1832~1837 A.D. 年間馬貴斯(Marquesas)島每年平均被擄80~100人(包括兒童及婦女)，人口因此突降至2萬人(Oliver, 2002)。可見戰爭在玻里尼西亞不僅殘酷，並且涉及宗教及族群存亡的關鍵問題。

為面對攸關存亡的挑戰，勢必從日常生活中做準備；強化戰士的宗教意識並在製造武器(包括獨木舟)時乞求神靈的加持賦予較多的「瑪納」。當衝突無法化解面臨戰爭時更須在戰神的廟宇，求神指點應戰或對戰方式或策略；請戰神護佑埋伏果園及菜園附近樹叢中，如圖12所見景象，伺機突擊或反擊？佯裝貿易商船隊伺機襲擊？或在開闊場地擺陣對戰等？

交戰後倘若取勝，表示負責率領戰爭的酋長深受神的關愛，有足夠的「瑪納」，威望日隆。若戰敗表示失去神的加持，「瑪納」不如英勇的戰士，威望褪色(Wright, 2009)；數次戰敗後「瑪納」喪失殆盡，面臨被社會精英逼退讓位的危機。

3.2.5. 小結

概言之，戰爭雖殘酷卻是人類生存極難避免的法則，不論是尼安德塔人時代或更早的史前社會或信史時代的今世。身為宗教及政治合一的酋長，為族群的生存而奮戰，無疑是神交付的基本職責。被迫擊退入侵的敵軍於海岸，或計劃性率軍出征討伐潛在性的強敵於境外，並以征戰所得擴張生活資源的遠程謀略，公認是文明演化過程有遠見的統治家為其族群建構永恆性生活願景的圭臬。準此而論，玻里尼西亞的宗教文化以戰爭的勝敗，評價酋長的領導能力，可說是文明進展的寫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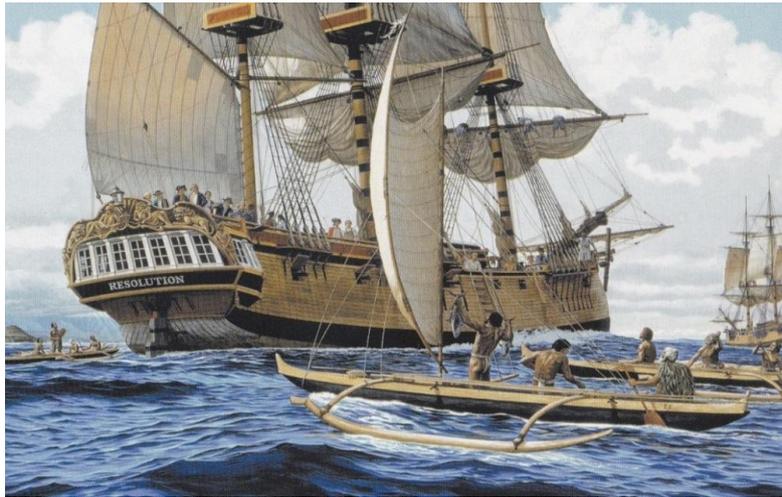


圖 13 獨特小巧的玻里尼西亞獨木舟，與庫克船長的大型遠洋船；獨木舟不僅有舷外支架以增加穩定度，其船頭與船尾並有交替使用的功能，以符航路曲折海象突變時能及時將船尾當船頭使用，俾便及時脫險之需 (Ridgell, 2006)

總而言之，多神崇拜的玻里尼西亞，18世紀末之前雖然仍有以戰俘祭拜神靈的陋習，但以宗教建構可捍衛社會紀律的文化，諸如神靈會以疾病懲罰宵小或盜賊及其近親，殺人者會被鬼魂糾纏至償還血債等作為社會運作有序的基礎，誠然是空前的進步。即使建造獨木舟及武器的高社會地位工匠及位高權重的酋長仍可以共同的宗教概念，「瑪納」與「塔普」作為能力及適任與否的評價依據，尤其是攸關族群存亡的戰爭。其道理無非是戰爭的勝敗固然與戰士在戰場的表現有關，但卻以族群可動員的整體力量為後盾。整體力量則是酋長掌控下長期性優質政經措施累積的成果。以戰爭結果，作為評價酋長領導能力的文化，不僅中規中矩並且是一種政治範型。

至於酋長擁有的曼納遠比別人高，仍因透過酋長的統治角色，可根據社會地位的高低公平分配給各個階層的庶民，以發揮神界代理人的統治效應，可說是薩滿教思維邏輯的延伸(Wright, 2009)與傳承現象的演化結果。畢竟文化的演進有回饋社會的功能，但新的文化也會產生新的社會問題，新的問題若不及時解決，新的文化將會陷入自身進步衍生的泥沼導致為害文化本質的反面效應。

換言之酋邦體制的玻里尼西亞社會，除浸透於宗教而蒸蒸日上，又能隨著社會演進的步調及時將園藝型農業社會衍生的新問題，以宗教的新思維衍生的價值體系，發揮匡正社會的效應於極致，誠然是中石器社會最偉大的成就。

四、集體性膜拜文化展現的農村

宗教之所以會隨著社會文化的演進衍生新的價值觀，正是因為需要宗教導正演化過程中產生的新問題，亦即引導社會解決新問題衍生的危機。當玻里尼西亞的酋邦因食物來源足夠日常生活所需，村莊規模

因而比狩獵採集時期大，內涵與結構又更加複雜時，宗教若未能及時以積極的態度扮演捍衛社會紀律的司法角色，不僅會陷入自身引發的社會性動盪以致喪失與鄰近酋邦競爭的能量致陷於劣勢，並且會遭遇隨時被征服而亡的後果。

可見文化之所以會往前邁進，宗教思維之所以會演化並衍道德向度更高的價值觀，無不因食物來源足夠日常生活所需而起。因此引發食物來源無虞生活所需，或超越日常所需並有多餘的經濟體「農業」，尤其是「農業革命」成為關鍵性的課題。

4.1 多餘食物的聚村效應

農業的基本元素是種植穀物，和畜牧業活動的綜合性產業。兩種綜合性產業之一的耕種穀物的原始型態：種植小米(millet或稱粟)和稻米(Rice)的活動，可能在10,000 B.C.發軔於西亞；之二的畜牧業最早約在9000 B.C.起源於山多林多的兩河流域之北部。由採集野生穀物到栽種穀物對人類的意義雖稍大於獵捕動物到馴養動物，但兩件事對人類的生活方式都有極大的影響；狩獵採集時代超過千畝的土地才能供養一家人生存所需，原始農業社會約25英畝的土地就能養活一家人(Roberts, 1998; Redman, et al., 2004)。換言之，農業生產的食物比從前提高40倍以上，這種驚人的成就表示邁入農業社會後人類已有多餘的食物供養非務農的人口。亦即，生產食物的農夫之外具有其他專長或志業的人士，只要能運用其專業技能服務社群，如製造生活用具或武器的匠師、捍衛社群安全的戰士，制定維持社會秩序的書吏，研擬社群發展策略的謀士等，同樣可以有獲得溫飽生活的保障並且社會地位往往高於生產食物的農夫。

這種匯集不同專業人士於一爐的村莊，及食物充足不虞匱乏的多元社會，不僅提高村莊的人口密度，



加速人口增加及村莊規模擴大的速度，並且加速形成組織化的村莊結構。有組織體制的村莊在有政治思維的謀士策劃下，建立專業人士分工合作的機制，往往可發揮無遠弗界的團體力量，往外擴展並回饋社群演化的社會現象，進一步締造更多元更有活力又更精緻的村莊。因此新石器時代的農業文化不僅是文明的母體，並且進一步為不斷演進的文明建構了城市生活的前提性基礎。

4.2 母神形構的村莊生活文化

獵捕動物除須具備熟練的技巧外，尚須具備敏捷的男性體能；女性由於先天上體型嬌小又有幼兒的牽絆行動較男性緩慢，因此不僅無法參與狩獵活動並成為拖累。定居化的農業社會產生的食物超越日常所需現象，不僅改變女人妨礙狩獵活動的意象，並且因聚群而居的生活特性，嬌小的體型已無礙於社群的活動更可發揮女性與生俱來的心思細密與耐勞的特徵。

從果園、菜園到田地裡的下游農耕工作，不僅可發揮女人揮鋤工作的勤勞本性；技術層面較高的上游工作，包括繁育家畜、播種種子呵護其發芽及照料幼苗等細緻性工作，更可發揮女性的耐心。勤勞與耐心的細緻工作長期累積而得的經驗，不僅馴化動植物的內容日益豐富並且領悟到培養新品種的奧秘；亦即經由雜交的技術改良野生品種以提高耐候性佳，產量又高的新品種以增加食物的來源，都是女人的貢獻(Mumford, 1961)。換言之，女人由採集食物的依賴人口躍升為農牧食物的生產人口，並且位居新經濟體系中食物來源不斷增加的主導性貢獻者。

從生活空間的語彙剖析，聚群定居的村莊結構不僅能為人類的繁衍和防禦外來侵擾的生活安全，提供優於小型漂泊不定的營地生活，並且不同家庭間亦可共同分擔照顧老弱與幼兒等繁雜的家務。因此家的空間格局恆以房舍為中心，再以身槽、畜柵、穀倉等結合防衛性的圍牆環繞形成一個基本生活單元，家(圖 14)。數個基本生活單元結合成生活上有互補性的群(cluster)，數個群連同毗鄰的田地形成生活圈及防衛圈都較大的村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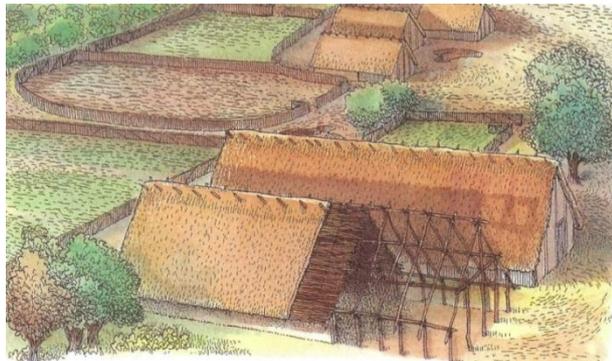


圖 14 以房舍為中心之家庭空間格局及圍牆環繞形成一個基本生活單元(Roberts, 1998)

總而言之，無論是以村莊為主體融合眾多不同

的家於一個整體，或以聚合不同的家，形構聚群式生活體的雙向空間結構為檢視的依據，新石器社會的集群化空間格局傳達一種清晰的文化思維：村莊係以母性為中心將生產與生活融合成一而運作的完整性有機體⁶。

母性受到如此重大的尊崇，表達在宗教的現象為母神的出現。玻里尼西亞的馬貴斯(Marquesas)群島，男神阿提亞(Atea)掌管光線，女神阿塔努絲(Atanus)掌管黎明，兩者並有夫妻關係。美索不達米亞的蘇美以男神恩基(Enki)統治大地，又供奉女神伊南娜(Inanna)為地母(Mother Earth)，並視為國王的夥伴(圖 15; Leick, 2001)等寓意深奧的性別上的搭配，以詮釋自然界運作的互補現象。亦即有黎明光線才能衝破黑暗照亮大地，有大地藍天才存在有意義。

這種因果關係形成的傳統是：母神保佑下農作物得以豐收，以母性生活為中心的村民以精緻的祭品舉辦盛大的慶典，回報女神的恩典。這種習俗不僅傳達了凡界與神界的雙向關係，並有人神互動的內涵。因此慶典中心成為村莊中心，故可說村莊中心由人神共構而成。

4.3 男神的農業革命效應

倘若靈魂和精神概念化，或定居式生活等文化，都是在不同的時間出現在不同的地方並且間隔時間很久，是文明演進的常態，則舊石器時代的狩獵採集與新石器時代的農業社會同時存在於人類世界的跨時代現象，不但不足為奇並且是正常的現象。

當農業發達食物過剩，村民長期浸潤於繁榮安逸的社會中，面對兇猛野獸侵擾農村，危害村民與農作物的挑戰而失去防衛能力與信心時，當年因嚮往無拘無束的豪邁生活選擇與農業社會分道揚鑣的舊石器社會的獵民，成為農村社會中奇貨可居的生存捍衛者。進一步從人類世界有得必有捨的因果論剖析，奇貨可居的保護者，經時間的推移與發酵，不僅成為村莊生活的靈魂人物並晉身為統治者，但演化時間很長。

從族群的社會性本質分析，肩負村莊安全的獵民及原有的村民是二種不同時代的典範。新石器社會的內斂型農村社群，以自給自足為終極目標；舊石器時代的獵民習慣以對付野獸的武器及強健的體魄炫耀其潛能，並以強制的手段體現其理想。兩種特性迥異的族群生活在規模不大的農村中，較古老的狩獵文化中那些已被淘汰的極富侵略性的基因，成為新石器農村中心的支配因素就不足為奇了。

人類最古老的歷史記載，美索不達米亞的吉爾伽美士(Gilgamesh)史詩的第二號英雄，神界派到凡界的獵手恩吉都(Enkidu)獵捕豺狼(圖 16; Ascalone, 2007)，以保護羊群及牧羊人的安全。史詩的主角，吉爾伽美士更以熟練的技巧及勇猛的體能捕殺或驅趕獅群等危害農村的野獸(圖 17; Ascalone, 2007)，之後成為烏魯克(Uruk)國王的史實均為佐證。





圖 15 統治大地的男神恩基及地母神伊南娜 (Leick, 2001)



圖 16 吉爾伽美士史詩的第二號英雄，神界派來的獵手恩吉都狩捕豹狼以保護羊群及牧羊人的安全 (Ascalone, 2005)



圖 17 吉爾伽美士史詩主角烏魯克國王捕殺或驅趕危害農村的野獸 (Ascalone, 2005)

當兩種不同文化融合於一，並衍生截長補短的整合效應加速農村的繁榮現象時，擁有可撼動山河與馴服自然之體魄的獵民晉身為酋長⁷。酋長在政治權力的激勵下建構尺度更大內涵更精緻的生活環境，以展現其影響力的企圖心日益增加。

首先是進一步生產更多糧食，其法為：引進新的農耕器材『犁(plow)』大幅擴大耕地。開闢密集的河道作為播種農作物不可或缺的水源，並為結合鄰近村莊所需的交通運輸用，亦即史家所稱的農業革命 (Morris, 1994)。

這種雙管齊下的建設展現兩種空間特色，其一為以陽剛勁的直線，形構容易確認的耕地及灌溉渠道，呈現十字相交的陽剛意象(圖18; Casson, 1965)，或圍封的幾何形體，如矩形建築空間等以傳達統治體的高度紀律及有序性的組織體制⁸。其二為集體性的信仰，取代各家供奉的原有神祇，亦即地位超越家神的太陽、月亮、雷電、天空、大地及海洋等；聖祠成為村莊的中心，酋長成為聖祠的主祭祀者亦成為神的代言人；憨厚勤勞的村民下降到被統治被監督的下人 (Benevolo & Culverwell, 1980)。倘若宗教、政治、經濟是城市文明的基本要件，則酋長統治下的大型村莊已具備邁進城市的格局。夏特費爾 (Catal Huyuk, c.6500-c.5600B.C.)及耶利哥 (Jerico, c.8500 B.C.)兩座大型繁榮的農村是這種演化過程中極好的見證。

4.4.耶利哥暨夏特費爾的見證

4.4.1 耶利哥見證的灌溉水神及祖靈崇拜

新石器時代極重要的先人遺址，聖經中的名城「耶利哥」19世紀末時，尚被埋於約旦河谷 (Jordan Valley)低於海平面250m的人工土丘下(南北長350m，

東西寬150m，土丘高21.5m)。1907-09 A.D.德國考古學家揭開耶利哥的發掘序幕，英國女考古學家坎揚 (Kathleen Kenyon)在1952~58 A.D.的考古發掘中進一步揭露人類文明史上迄今最古老的城鎮化村莊遺址的完整脈絡。亦即從10000 B.C.起，迄舊約聖經中約書亞記 (Joshua)第6章所提「.....城牆塌陷.....」之c.1400~c.1250 B.C.為止的演化序列。這個序列佐證耶利哥稠密的人口居住區，堅固的防禦設施及完善的行政體制，根據放射性元素碳14之檢測可回溯到8000 B.C.，若計入遺址最底層發現之中石器 (Mesolithic, 10000 B.C.~5000 B.C.)時代的獵人主導村莊發展後在灌溉農田的渠道邊興建祭祀泉水的聖殿 (Sanctuary)則可上溯到9000 B.C.。

這一千年的時差正是遺址發掘人坎揚 (Kenyon, K.)1979發行的聖地 (Holy Land)考古報告中所稱：獵人的後裔經歷長達千年的時間，才由游動漂泊不定的生活演化為定居式農耕生活的佐證。

耶利哥遺址的新石器時代居住區集中在第9~17層；第9層有發現陶器，第10~17層為考古學上所稱「前陶新石器文化A層」故未見陶器。坎揚命名的「前陶新石器文化A層」則是當今世界所見年代最早的城鎮化耶利哥，廢墟面積約4公頃，常住人口約2千人居住於直徑約5m由日曬磚砌造形構的圓形豎穴居室，從事農業生產馴養牛、豬和綿羊，掌控燧石製作工具的純熟技術。

故居住區周圍均由厚2m、高4m亦有高達8m之石材砌造而成之城牆保護；城牆外尚有一條寬6.44m、深2.43m的護城河，城牆基礎與護城河則由同屬一體的大型磐石鑿琢而成。城牆內尚有直徑10m、高8.5m以上內有樓梯直通頂層之防禦用大型塔樓 (圖19; Chant & Goodman, 1999)，耶利哥防禦設施工程之精緻堅固由此可見。





圖 18 容易確認的十字相交形耕地及灌溉渠道形構的陽剛形格局 (Casson, 19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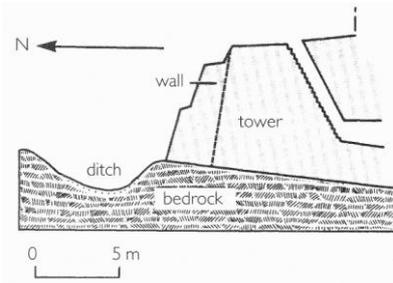


圖 19 耶利哥堅固的防禦設施中高 8M 以 22 級石階直通頂層之石造塔樓遺址照及城牆剖面圖 (英國耶路撒冷考古團) (Chant & Goodman, 1999)

c.7300 B.C.耶利哥開始衰弱，之後由來自敘利亞等不同文化體系的人移入定居，形構坎場所稱之「前陶新石器時代B層」遺址。B層遺址的居住空間特色為：使用扁平的土坯磚砌造的方型住屋，屋內有神龕，居住區內有較新的祭祀用建築；之外並發現10具使用灰泥按照死者生前面貌，眼睛以貝殼鑲嵌復原的人頭。這種發現無非佐證了當時的習俗乃以崇拜祖先為宗教信仰的主軸。

c.6000 B.C.耶利哥再度被遺棄；c.4500 B.C.定居耶利哥的人已會製作陶器，形成「有陶新石器時代」的居民大約居住500年左右又遷居他鄉。c.3000 B.C.的青銅器時代早期耶利哥再度繁榮，除盛行多人合葬的習俗外還以土坯磚興建城牆.....則坎場所稱之「原始都市期」；因城鎮化居住區經歷多次興廢，終被阿摩利人⁹的大火所廢，並淪為狩獵採集習性尚存的阿摩利人的宿營地。c.1900 B.C.又由來自敘利亞的民族佔據並重建耶利哥；進入中青銅器時代的耶利哥城鎮高度發展，也是史上最繁榮的時代。

4.4.2 夏特費爾見證的母神及由屋頂進出的持久性房屋

土耳其境內最大，西南亞最重要的新石器時代遺址，位於今之康雅(konya)東南50km處，海拔3千英尺的安納托利亞高原。遺址包括二個外貌高約17.5m、面積約12公頃(長450m、寬275m)的橢圓型土堆；1961-63 A.D.的考古發現新石器時代毀棄的房屋構材，分12層重疊堆積而成的廢墟厚度共高19m(耶利哥為21.5m)；最上層為c.5600 B.C.的房屋遺址，最底層為最早的房屋可上溯到c.6500 B.C.(Gates, 2003)該次發掘之重要在於見證了夏特費爾是一個富有並且由宗教主導的社會。由於村莊規模達12公頃，安納托利亞高原又不出產石材，興建規模龐大又堅實的石造城牆幾乎不可能；故以成排的儲藏空間為住宅群外圍，佐以厚實的日曬磚牆發揮村莊的防衛功能，之外並以進出住家均利用木梯經由屋頂進出居室，非由尋常所見

牆體中之開口為居住單元之門戶，以補未有石造城牆之缺憾 (Morris, 1994)。圖20所示為環繞共用開放空間形構的居住單元群局部大樣。梅拉特的開挖區約為一英畝，共139居住單元，相當於全村面積的1/30，當中卻有40餘單元之空間建構不僅極精緻考究，並有軸線化格局的母神神像和公牛造像的聖殿(圖21)，顯然是社會地位超高祭司居住的宗教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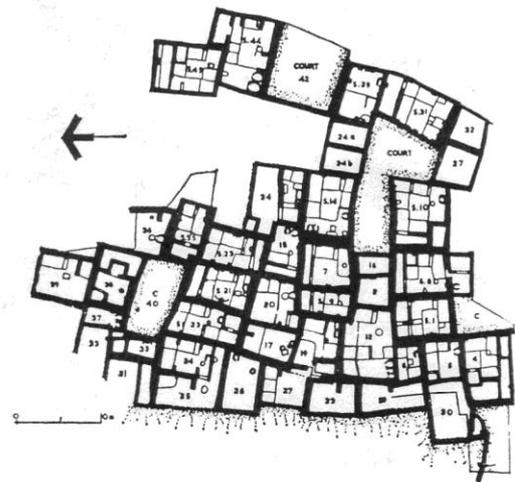


圖 20 夏特費爾所見數個居住單元環繞共用庭院，除以樓梯經由屋頂進出外並以儲藏空間較厚的外牆體(西邊)做為防禦設施以補未有石造城牆之缺陷的聚群式空間結構格局之部分大樣(Morris, 1994)

英國另一組考古學家馬休茲(Roger Matthews)及荷道(Ian Hodder)因嚮往梅拉特發現的宗教區之精緻生動及文明演進上極有象徵意義的壁畫與浮雕，諸如母神與公牛神。此外，原有1/30的發掘區能否傳達全村的空間結構之社會涵構？也不無疑問。故於1993 A.D.再次進行夏特費爾的考古活動。但規模達12公頃，時間上又有30年左右的差距，為避免小型與零散破舊的房屋群掩埋於新的沖積層或可能已腐蝕不成形，產生混淆實際的狀況，故認為全區性的發掘既不可能也



無必要(Matthews,20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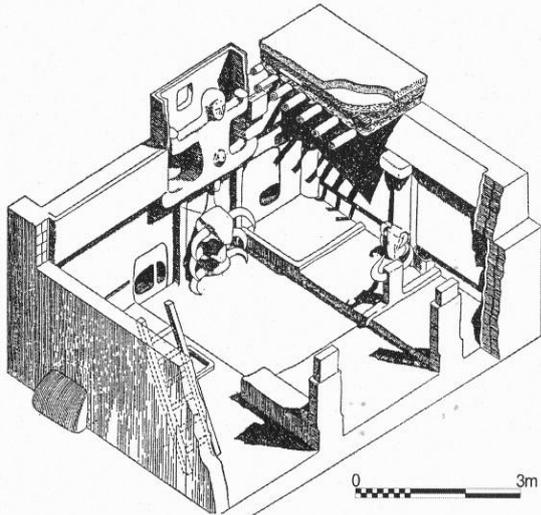


圖 21 夏特費爾考古所見 40 餘座構建精緻，並以軸線化格局彰顯對農業極有貢獻的母神神像及公牛像的家居式神祠，故公認為祭司居住區(Matthews, 2003)

惟聚村是一種實體化的物質性生活空間，其形構與區域性的周遭地理環境息息相關，故再次調查的工作重點以系統化的研究理念為基礎，俾便建構聚村形成的歷史背景為主軸。至於宗教區那些栩栩如生但隱含暴力的浮雕與壁畫，即以雙極性(polarit)的思惟，諸如男與女、內與外、生與死、野放與馴養的互排性與互補性作為詮釋與評價的基礎(Hodder,1990)。探查的結果，對梅拉特1960s在夏特費爾的發現多所肯定並且讚譽有嘉。

4.4.3 小結：宗教主導社會及回饋社會的佐證

新石器時代極重要的二個先人遺址之一的耶利哥，位於海平面下250m的約旦河谷，夏特費爾卻位於海拔高1000m的高原，兩者地理環境堪稱迥異；但卻同屬於土地肥沃水源充足，有利於農業活動的肥沃月灣(The Fertile Crescent)地理區，亦即從埃及的尼羅河北向，沿東地中海和巴勒斯坦(Palestine)，經安納托利亞高原，通往裏海南端和伊朗之間的群山，銜接兩河流域形構的美索不達米亞平原，整體外貌呈現半月形的農耕地帶。故二者也都是文明演進上對農業極有貢獻的前導性村莊。

耶利哥挖掘發現的意義在於：早在c.9000 B.C.已有繁榮的農業社會，並有祭祀灌溉農田的水神之神殿，但宗教文化仍以膜拜祖靈為主軸，經濟更以農耕為主。如此現象佐證了耕種小米(或稱粟millet)和稻米的史實，約在10000B.C.發軔於西亞的肥沃月灣。

夏特費爾發現的宗教區建築中之壁畫和浮雕的意義在於：見證了女人對馴化動植物，透過雜交的技術改良野生品種培育新品種，以增加農業收成，並奠定新經濟體系中食物來源不斷增加的主導地位。構件精緻的殿堂特別是地母神 (God of Mother Earth)在上、

公牛在下的3維中軸線空間格局，不僅能彰顯母神的偉大，亦能以上下的位序傳達尊卑的地位及貢獻的高低關係。這種格局的卓越不僅意象生動，更是宗教思維主導社會與回饋社會的佐證。

惟母神與公牛之外，其膜拜對象卻未見有神格較高又可掌控天候的神靈，亦缺可匯集族群力量於一的集體性膜拜文化。此外，既無半農半獵社會的玻里尼西亞所見組織化及紀律化的宗教社群，更不見能整合宗教與政治的首長式領導人。

沒有社群(Community)那來組織化社會，沒有組織化社會則無法鏈結族群，族群無從成長茁壯。沒有政教合一的領導人，村莊經濟再繁榮也難擺脫固步自封日趨衰微的進化法則。耶利哥最後毀於組織體制嚴密，但手無寸鐵的一神論信徒(Joshua, 6)就是佐證。

換言之，新石器時代那二座極有文明價值的先導性農村遺址之根本問題為：缺乏可彙整政治、宗教及經濟資源於一的文化，及由此衍生可對外擴展，對內管控不可或缺的軍事化機制。故整體言，對文明的貢獻著重於農業經濟的成就與繁榮。以宗教結合社群領導村莊往前邁進的能量，反不如之前的園藝型農業社會的玻里尼西亞。城市史家摩里士(Morris, 1994)等認為耶利哥與夏特費爾只能算是大型的棲居地、或極繁榮的農業村莊，亦即一種城鎮的原型(proto-town)，尚無法稱為可象徵文明的都市(Morris,1994)之理至明。

五、結論

現代人的祖先「智人」及更早的尼安德塔人，因敬畏未知世界的神靈，將可抵禦天候之害又能防範野獸侵襲的洞穴，構建成可長期祭拜並為族群聚會的聖祠與聖地，公認是宗教思維主導人類生活的開端。之後從游動移居式的狩獵採集生活進入定居式園藝型農耕社會，再由園藝型農業社會邁入以農維生的時代。亦即，食物來源更可靠、更充足，也更有餘力從事敬畏神靈的活動及構建活動所需的神祠與神殿。更多神祠與更普遍化的慶典活動，為芸芸眾生開啟了一扇對超自然的神靈傾訴困惑、尋求解答與乞求保佑之門。宗教信仰因此比從前更強烈更堅定。以神靈為中心的思維，不僅毫不遜於數萬年前的尼安德塔人時代的社會，宗教主導大眾生活的力量更為明顯更為強烈。洞穴時代就出現的薩滿教，玻里尼西亞的宗教社群，農業社會的母神等，都是見證。惟宗教對人類社會極有貢獻的道德向度不是隨同靈魂概念化與儀式化的現象一併出現，而是凡界與神界長期互動的成就。因此本研究針對宗教文化與現實社會間的互動性演化再歸納二點剖析，作為結論。

5.1 宗教文化的精髓

宗教信仰因可匯集群眾的力量掌控社會資源，體現族群共同追求的目標，以展現族群的成就，故公認為一種極偉大又能主導城市發展的文化。西方世界一



直到文藝復興時代仍以興建大教堂展現城市的驕傲；佛羅倫斯(Florence)1285 A.D.拆除狹小的聖雷巴拉塔(St. Reparata)教堂，1436完成氣勢宏偉的百花教堂(The Cathedral of Santa Maria del Fiore) (Berti, 1979)；羅馬於1626 A.D.完成的聖彼得大教堂(Braunfels & Northcott, 1988)都是見證。惟偉大的文化也有灰暗的一面，尤其是原始宗教，包括南美洲的阿茲特克(Aztecs)，不都有食用戰敗者或以擄獲的戰俘祭祀自家神靈的野蠻習俗？

另類稍為進步的灰暗面，則出現在少數心術不頂光明的野心客，覬覦宗教擁有的龐大資源，隱身宗教界利用宗教的光環提升社會地位，伺機攫取物質利益或謀取政治利益為目標。因此，狩獵採集時代薩滿教主導的村莊盛行的現象為設法取得薩滿師的身分與地位，以晉身宗教圈為目標的人不僅需展現可預知與能掌控未知世界的的能力，並且不惜一切以自殘方式彰顯通靈能力以博取社會的認可。

亞馬遜河西北的杜卡諾安(Tukanoan)人以長時間不睡眠方式催生幻覺，北美大草原的克勞(Crow)人在山頂上獨處並禁食四晝夜以追尋「靈境」。有時更殘酷，自行砍下左手一節指頭。澳洲的情況不遑多讓，在極敏感的舌頭刺穿一個小指大又不會閉合的孔洞，或用刀在舌頭上割痕，並用尖刺刺穿指甲的血腥方式證明進入靈界。較緩和又幸運的情況為大難不死，如被雷擊或蛇咬，或夢見有預知性又超越想像的怪事等，也成為晉身薩滿師的條件(Wright, 2009)。總而言之，為追求目的不擇手段，因此雖有不少信仰虔誠的薩滿師，但當中難免有為一己謀取私利的騙徒。

因此，就現職薩滿師言，必須持續不斷展現擁有超自然能力以確保聲望；北美印第安奧吉布瓦族(Ojibwa)的宗教領袖，如無法顯示與超自然界維持良好的運作關係，便會被撤換。

必須一提的是前農業社會的薩滿師，為人驅走惡靈治病收取的酬勞雖微薄，但崇高的社會地位往往享有超越習俗規範的特權。例如奧吉布瓦族(Ojibwa)收取菸草，但當上宗教領袖後，男性薩滿師則有娶數位妻子之權；東部愛斯基摩人收受雪橇和挽具，名望高的薩滿師更可當眾以「對神靈不敬」並且觸犯禁忌為由，指控特定女性對象，並且命令被指控者與他上床，透過二性合體以超自然的能量洗滌她的罪孽(Wright, 2009)。但畢竟冒犯禁忌只是原始宗教中少數心術不正的人，扭曲信仰的真諦褻瀆神靈的情形；宗教匯集社會的力量從事追求與體現社會的共同目標，諸如構建敬畏神靈的聖祠或聖地乃是宗教文化的主流。

總而言之，若說有明確的信仰，明確的神靈、高道德向度的教義和體制化的膜拜儀式並由一個機構主導是宗教的關鍵要件；信仰與神靈均未定型的宗教是宗教的原型。則狩獵採集社會的薩滿教正是賴特(Wright, 2009)書中(The Evolution of God)所提：制度化與組織化宗教出現的先導，更是體制化宗教的大主教

或伊斯蘭什葉派的領袖阿亞托拉(Ayatollah, Shia, Islam) (Armstrong, 1992)的前身。可見預言與掌控未知世界的薩滿教道德向度雖不高，但在文明演進上扮演的角色仍具有承上啟下的關鍵性地位。

5.2 宗教與村莊社會的雙向互動

數萬年以來宗教之所以能夠成長茁壯之主要原因是，宗教能針對芸芸眾生面對煩惱困惑時適時提供慰藉。科學上言透過慰藉不僅可紓解或消除緊張的情緒，發揮與生俱來之免疫系統的自療功能，並能達到延年益壽的長命效應。惟社會文化不斷演進，芸芸眾生遭遇的煩惱與困惑，始終隨著時間的推移及社會面對的問題而改變。狩獵採集時代最大的問題是無法掌控食物來源，忍飢挨餓是常有的現象。園藝型農業時代以降，食物來源穩定並且超出日常所需；故不從事農耕工作的人不僅能運用其專業技能謀生，並且社會地位高於生產食物的農夫；換言之社會結構顯然不同。

亦即，相較於園藝型農耕(亦即半農半獵)社會，狩獵採集時代居無定所的獵人幾乎無法也不能儲蓄值錢的財物。社會既無偷取他人財物的問題更不必有防範土地被竊佔的顧慮；原始宗教也無必要針對偷竊財物危害他人權益的卑鄙行為表達懲罰宵小的意識。園藝型農業社會時代的首邦，如玻里尼西亞所見，不僅村莊規模比從前大，人際關係比從前複雜，人人都有或多或少唯恐被人偷竊的財物更有捍衛辛苦掙得之居所及耕種所需農地之權益，以免公然被毀損或被竊佔及被侵占後的懲罰之訴求。亦即剷除罪惡制定維持社會秩序不可或缺的生活規範，成為共同追求的目標。

惟首邦出現之初尚無管理社會大眾之完整體制可言，更無周延的法令規章，被害者自行執法懲罰加害者的報復行為又不鼓勵之情形下，社會秩序陷入真空狀態之際，宗教及時提高道德向度填補法令規章之不足以捍衛社會應有之公平正義。因此半農半獵社會的玻里尼西亞神靈會以疾病懲罰宵小，或以死亡對付盜賊及其近親，殺人兇手會被鬼魂糾纏直至血債血還的因果報應。

玻里尼西亞的宗教為維護社會秩序更有監管土地所有權的司法角色，很多島嶼不僅在菜園或果樹林豎立界標，施下由神靈監管的禁忌，警告闖入者和偷竊者會遭受神以疾病和死亡的懲罰。

總而言之，玻里尼西亞的神對為非作歹的敗類會加以懲罰，但對奉公守法信仰虔誠的普羅大眾也會給予庇佑；對位高權重的統治階級更有約束性的文化。玻里尼西亞的「瑪納(Mana)」就有以法力獎償的實質內涵，也以「塔普(Tapu)」規範或限制神獎償的法力(瑪納)俾便必要是罷黜危害芸芸眾生的統治者。因此神授統治的首長為維繫其統治權，無不以較別人特多的瑪納及其他資源從事芸芸眾生生存所需之重大公共事務，諸如修建與維護道路，開闢灌溉渠道，組訓軍隊



抵禦外侮，籌辦節慶敬畏神恩，犒賞終年辛勞的普羅大眾，照顧氣候條件欠佳的杜莫杜等群島或無法生產農作物的低海拔珊瑚礁島嶼的居民。作為鏈結神界與凡界的雙向互動為基本模式，並為文明的典範。

半農半獵時代的宗教以如此積極的方式扮演司法角色，有文化本質及文化演進上的雙重意義。首先是因應新問題極需宗教以新的思維喚起人類內心世界明辨是非的潛在性本能，以發揮導正社會的效應。如此論證源於人類因應解決新文化衍生的新問題所仰賴的解決辦法，包括法令規章，需要通過長期的生活檢驗方能制定，故往往緩不濟急。

農業革命後的美索不達米亞城邦，一直到巴比倫帝國的漢摩拉比(Hammurabi, 1792 B.C.~1750 B.C.在位)時代才在太陽神沙瑪什(Shamash)的見證下頒佈完善而揚名的法典以維護社會秩序(Chadwick, 2005)。之所以完善而揚名，不僅法典以多達282條文字規範工商活動、傷害偷竊、及婚姻等廣泛層面；並以前瞻思維擺脫過去的窠臼。亦即游牧民族生活時代的阿摩利人(Amorite)的傳統習性，或玻里尼西亞人遺留之「以牙還牙、血債血還」的報復性懲罰，佐以賠償受害人損失(McIntosh, 2005)並提供犯罪人改過向善機會。及由此衍生，21世紀仍奉行之：原告及被告雙方的辯結制法典而揚名萬世。但有關土地所有權的管理，根據考古所得是千年後統治巴比倫的第三王朝卡希特人(Kassities, 1600 B.C.~1155 B.C.)所遺留的泥板上所繪耕地與灌溉用水路相關的地圖，及地界石(Leick, 2001)才出現人類社會立法管理土地，確保財產制之佐證。換言之從14000 B.C.左右出現的中石器社會問題，到青銅器時代末期的卡希特王朝時代的地圖及地界石之間相隔超過一萬年。可見人類社會在漫長的時間裡，缺乏社會有序運作所必須的土地所有權制建立之前的社會秩序空窗期，係由宗教文化發揮司法功能填補而成，宗教對人類社會貢獻之顯著由此可見。

綜合而言，半農半獵時代出現的玻里尼西亞酋邦，或新石器初期的先導性農村建構的酋邦，都是人類世界先進的社會組織；更是史前社會與史前宗教的最後一代演化過程之見證。這些酋邦的內涵，雖因地區或時代的變化出現差異，但卻有共同的特色。都是體制化宗教的前導，更是極度依賴超自然界的宗教文化，凝聚族群的力量建構的統治體。酋邦社會與狩獵採集時代的薩滿教社會之區別，在於薩滿教缺乏明確的膜拜對象，更缺乏制度化的膜拜方式，故極難產生族群的共同生活願景。共同生活願景是凝聚族群力量之本，公認是社會進化之所賴。沒有共同生活願景的社會，難逃停滯不前的進化法則。換言之，薩滿教雖有社會地位崇高的薩滿師，卻鮮少政治角色鮮明，足以領導族群往前邁進的薩滿師。薩滿教的村莊，因此步上衰微的宿命。

相較之下，酋邦社會因有明確的膜拜對象，集體化與制度化的社群膜拜基調，政治與宗教又融合於一。肩負政治責任的酋長成為神的化身，稍有政治思

維的酋長，可輕易號召村莊的各階層人士，發揮如同人體各器官的生物功能，以同一種節奏同一種秩序的整體性運作功能，朝共同性生活願景邁進，才得以締造不凡的文化，成為城市文明的前導。

人類迄今所見最早的城鎮化聚村，耶利哥與夏特費爾，雖因缺乏較高的膜拜對象及體制化宗教社群致無法登上城市的殿堂。惟耶利哥遺址最底層的建築，乃是祭祀灌溉用水神的神殿；夏特費爾也以敬畏對農業經濟貢獻最卓越的女性，即地母神為主軸。美索不達米亞最早城市烏拜德(Ubaid)文化期的埃利都(Eridu)之第一個建築，亦即銅石時代(Chalcolithic, c.3800 B.C.)興建之神殿，就是神格位階更高的『供奉智慧與水神恩基(Enki)』的專屬神殿，並為城市的守護神(Leick, 2001)。可見集體化膜拜特定神靈是文明進展的見證。

參考文獻

- 方永泉 (1998)。宗教與道德間的關係—兼論多元社會中的宗教與道德教育。《教育資料集刊》，(25)，99-125。
- 呂理哲，黃宣衛 (2012)。近十年臺灣南島民族宗教研究的人類學回顧 1999-2010。《漢學研究通訊》，31(3)，15-24。
- Armstrong, K. (1993). *Muhammad: A Biography of the Prophet*. U.S.A: HarperOne.
- Barrow, R. (1981). *The Philosophy of Schooling..*
- Benevolo, L., & Culverwell, G. (1980). *The History of the City*. London, UK: Scolar Press.
- Berti, L. (1989). *Florence, the City and Its Art*. Firenze, IT: Becocci.
- Braunfels, W., & Northcott, K. J. (1988). *Urban Design in Western Europe: Regime and Architecture, 900-1900*. Chicago, USA: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Chant, C., & Goodman, D. (1999). *The Pre-industrial Cities & Technology*. London, UK: Routledge.
- Kaeppler, A. L. (2008). *The Pacific Arts of Polynesia & Micronesia*.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eick, G. (2001). *Mesopotamia, The Invention of The City*. London, UK: Penguin.
- Liu, L., & Chen, X. C. (2012). *The Archaeology Of China, from the Late Paleolithic to The Early Bronze Age*.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aisels, C. K. (1993). *The Near East, Archaeology in the Cradle Of Civilization*. London, UK: Routledge.
- Matthews, R. (2003). *The Archaeology of Mesopotamia, Theoris & Approaches*. NY, USA: Routledge.
- Mcintosh, J. (2005). *Ancient Mesopotamia: New Perspectives*. CA, USA: Abc-Clio.
- Morris, A. E. J. (1994). *A History of Urban Form: Befor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s*. Harlow, UK: Longman Scientific & Technical.
- Mumford, L. (1961). *The City in History: Its Origins, Its Transformations, and Its Prospects*. London, UK:



- Secker & Warburg.
Oliver, D. (2002). *Polynesia, in Early Historic Times*. HI, USA: Bess.
Price, N. (2001). *The Archaeology Of Shamanism*. NY, USA: Routledge.
Redman, C. L., James, S. R., Fish, P. R., & Rogers, J. D. (2004). *The Archaeology of Global Change, The Impact of Humans on Their Environment*. Washington, D. C., USA: Smithsonian Books.
Ridgell, R. (2006). *Pacific Nations & Territories, The Islands of Micronesia, Melanesia & Polynesia*. HI, USA: Bess.
Roberts, J. M. (1998). *Prehistory & The First Civilizations, Th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World, Volume 1*.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Tattersall, I. (2012). *Masters of The Planet : The Search for Our Human Origins*. NY, USA: St. Martin's Griffin.
Wright, R. (2009). *The Evolution of God: The Origins of Our Beliefs*. London, UK: Little, Brown.

REFERENCES in English

- Ascalone, E. (2007). *Mesopotamia: Assyrians, Sumerians, Babylonians*. U.S.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arrow, R. (1981). *The Philosophy of Schooling*. U.K. : Harvester Wheatsheaf.
Benevolo, L., & Culverwell, G. (1980). *The History of the City*. London, UK: Scholar Press.
Berti, L. (1989). *Florence, the City and Its Art*. Firenze, IT: Becocci.
Braunfels, W., & Northcott, K. J. (1988). *Urban Design in Western Europe: Regime and Architecture, 900-1900*. Chicago, USA: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asson, L. (1965). *Ancient Egypt*. New York: Time-Life
Chant, C., & Goodman, D. (1999). *The Pre-industrial Cities & Technology*. London, UK: Routledge.
Fang, Y.C. (1998).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ligion and morality on Religions and Moral Education in Pluralistic Society. *Bulletin of Educational Resources and Research*, (25), 99-125.
Gates, C. (2003). *Ancient Cities: The Archaeology of Urban Life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and Egypt, Greece, and Rome*. New York.: Routledge
Kaepler, A. L. (2008). *The Pacific Arts of Polynesia & Micronesia*.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u, L.C. ; Huang, S.W. (2012). A Retrospective of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on Taiwan Austronesian People's Religions, 1999-2010. *Newsletter for Research in Chinese Studies*, 31(3), 15-24.
Leick, G. (2001). *Mesopotamia, The Invention of The City*. London, UK: Penguin.
Liu, L., & Chen, X. C. (2012). *The Archaeology Of China, from the Late Paleolithic to The Early Bronze Age*.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aisels, C. K. (1993). *The Near East, Archaeology in*

- the Cradle Of Civilization*. London, UK: Routledge.
Matthews, R. (2003). *The Archaeology of Mesopotamia, Theoris & Approaches*. NY, USA: Routledge.
Mcintosh, J. (2005). *Ancient Mesopotamia: New Perspectives*. CA, USA: Abc-Clio.
Morris, A. E. J. (1994). *A History of Urban Form: Befor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s*. Harlow, UK: Longman Scientific & Technical.
Mumford, L. (1961). *The City in History: Its Origins, Its Transformations, and Its Prospects*. London, UK: Secker & Warburg.
Oliver, D. (2002). *Polynesia, in Early Historic Times*. HI, USA: Bess.
Price, N. (2001). *The Archaeology Of Shamanism*. NY, USA: Routledge.
Redman, C. L., James, S. R., Fish, P. R., & Rogers, J. D. (2004). *The Archaeology of Global Change, The Impact of Humans on Their Environment*. Washington, D. C., USA: Smithsonian Books.
Ridgell, R. (2006). *Pacific Nations & Territories, The Islands of Micronesia, Melanesia & Polynesia*. HI, USA: Bess.
Roberts, J. M. (1998). *Prehistory & The First Civilizations, Th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World, Volume 1*.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Tattersall, I. (2012). *Masters of The Planet : The Search for Our Human Origins*. NY, USA: St. Martin's Griffin.
Wright, R. (2009). *The Evolution of God: The Origins of Our Beliefs*. London, UK: Little, Brown.

註解

¹從歷史來看，宗教與道德間關係頗為緊密(Barrow, 1981)。在某些社會中，所謂的「道德規範與義務」(moral norm & duties)與「宗教義務」(religious duties)之間甚至無明顯區分。雖然現今道德本質已非完全以宗教為出發點，然而道德建構於膜拜「天」為基礎，這種從膜拜神靈、宗教具體成形所逐步發展的道德，正代表了一種人類對於不可知力量的敬畏、對於自然的尊重及對於自我的克制等。道德本身也因此帶有相當濃厚的早期膜拜及宗教之意味(方永泉, 1998)。

²西起非洲的馬達加斯加島，中經馬來半島，南洋群島，夏威夷群島，東至智利的復活島(Easter Island)涵蓋的地區。台灣比較常見的譯名為「南島」，這是來自日本人翻譯的詞彙，英文原名則於 1899 年由學者 Wilhelm Schmidt 自拉丁文字的字根「auster」與希臘文「nēsos」所合組而成，前者為南風之意，後者意指多島，所以日本語將「Austronesia」翻譯成「南島」。然而以南島稱之，卻容易讓讀者誤解為僅限於東南亞至夏威夷群島之狹隘觀。本文在此維持其原有音譯，以突顯原英文所稱之廣大地理疆域。

³今稱帛琉(Palau)位於菲律賓民答那峨(Mindanao)東



640km 處的加羅林群島西端，由數個大小不一的火山及珊瑚島礁組成，可居地島嶼共 8 個。種系(Ethnic)語群共二。其一為使用不同於密克羅尼西亞群島的帛琉語族系。另一為使用類似加羅林群島的雅浦島與塞班島嶼通行的方言(Kaeppler, 2008; Ridgell, 2006)。貝勞 Belau 為固有語言，帛琉(Palau)為西化後的英譯名。因本文論述主旨為史前社會文化，故沿用原有的 Belau 以符史實。

⁴近來雖有另一派學者開始主張所謂的出台灣說，然而南島民族之起源仍多有爭議。如以構樹基因主張出台灣說學者，並無法解釋鄰近台灣的菲律賓卻沒有帶著 CP-17 基因的構樹？本文則與中研院民族所學者黃宣衛看法類似，認為早期人類出於未知的敬畏感與好奇心，而逐漸發展出對於特定神靈的共享信仰與儀式並進而散佈至其他島嶼(呂理哲及黃宣衛，2012)。

⁵ 15 世紀的西班牙在貪婪心態的驅使下為掠奪物質上的金銀財物，恣意擄殺反對人士。諸多珍貴的文化財，包括城市起源過程的關鍵性文獻，在懲罰反對人士及難於攜帶返歐的情況下被當成累贅而燒毀，引發世人極大的撻伐。

⁶故又有母系社會之稱

⁷公元前第 3 千紀擊敗阿卡德(Akkad)帝國第 5 代君王沙爾·卡里·沙里(Shar-Kali-Sharri, 2217~2193B.C.在位)大軍的阿摩利(Amorite)人是烏魯克國王之後的見證。

⁸阿摩利人(Amorite)於 1894B.C.創建的古巴比倫遺址頗具代表性。

⁹居住於幼發拉底河中游西北邊山區在古代閃米特(Semite)的一支。即註 7 所提公元前第 3 千紀擊敗阿卡德帝國大軍的獵民先祖。

